

苏修对外 “援助”的实质

辽宁人民出版社

苏修对外“援助”的实质

辽宁财经学院《苏修对外“援助”的实质》编写组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沈阳

苏修对外“援助”的实质

辽宁财经学院
《苏修对外“援助”的实质》编写组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建平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4 1/4
字数：84,000 印数：1—14,000
1976年9月第1版 1976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90·495 定价：0.27元
. (内部发行)

目 录

第一章 苏修对外“援助”的概况	(1)
第一节 苏修对外“援助”的动机	(2)
第二节 苏“援”在世界各地的分配	(9)
第三节 苏修对外“援助”的特点	(22)
第二章 苏修利用“援助”进行剥削和掠夺	(27)
第一节 残酷掠夺重要资源	(28)
第二节 推销陈旧劣质商品	(45)
第三节 贵卖贱买，攫取超额利润	(53)
第四节 大做军火商，大发战争财	(74)
第三章 苏修利用“援助”进行控制和扩张	(80)
第一节 加强经济控制，竭力变受“援”国 为自己的经济附庸	(81)
第二节 加紧对受“援”国的政治控制 和军事扩张	(103)
第四章 苏修对外“援助”的后果	(119)
第一节 苏“援”给受“援”国造成的恶果	(119)
第二节 受“援”国的觉醒与反抗	(127)

第一章 苏修对外“援助”的概况

伟大领袖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是我们认识当前国际形势和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锐利武器。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世界上各种基本矛盾，特别是苏修、美帝两个超级大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都在进一步激化。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和捍卫民族独立，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资源的斗争，有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发展。第三世界作为一支朝气蓬勃的新兴力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打击下，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为了摆脱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竭尽一切力量向外扩张，进行空前激烈的争夺，闹得世界很不安宁。这种大乱，乱了敌人，分化了敌人，锻炼了人民，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推动着世界革命的进程。

在苏美两霸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抱着比老沙皇更加狂妄的野心，疯狂进行侵略扩张，千方百计地挖对方的墙脚，极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它“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7页）

苏修的对外“援助”，是它争夺世界霸权的一种手段。

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的总结报告中，公然叫嚷：“对外经济联系是有助于解决政治和经济任务的有效手段。”苏修所要解决的政治和经济任务，就是政治上的控制和压迫、军事上的侵略和扩张、经济上的剥削和掠夺。长期以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通过所谓对外“援助”，大搞资本输出，掠夺和压迫第三世界国家，控制和欺负第二世界国家，疯狂掠夺它们的重要资源，向它们倾销商品，榨取超额利润，争夺战略要地，推行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妄图把受“援”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当代最大的国际压迫者、剥削者和新的世界战争的最危险的策源地。

五十多年前，列宁在揭示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时，指出：“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列宁选集》第2卷第731页）苏修的对外“援助”，实质上就是资本输出，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认真研究和彻底揭露苏修对外“援助”的凶残实质，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清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性，认清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深入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深入批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妄图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反革命阴谋，提高对执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把反帝反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第一节 苏修对外“援助”的动机

苏修的对外“援助”，是受帝国主义的规律所支配，充

满着殖民主义的动机的。

在斯大林逝世以后，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后，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大大膨胀起来，占据了党、政、军和经济、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形成了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机器和支配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即新型的大资产阶级。这个新型的大资产阶级，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基础。

苏修叛徒集团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机器，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把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这个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的国家，已“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剥削更多的公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8页)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比较，在实质上都是一样的，但具有集中程度更高、垄断规模更大、控制范围更广、对经济的干预更直接等特点。它是苏联大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

苏修叛徒集团采取了种种的措施，进一步加强官僚垄断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在赫鲁晓夫时期，开始了所谓“利别尔曼建议”的试验，制定出一套适应于官僚垄断资本统治的领导和管理体制。继赫鲁晓夫之后，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全面推广了所谓“新经济体制”，加强了官僚垄断寡头对劳动人民

的剥削。从一九六八年起，又全面推广建立大型生产联合企业的“经验”。在苏修二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勃列日涅夫叫嚷：“建立生产联合公司和联合企业的方针必须更坚决地加以贯彻，将来它们应该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核算单位。”这一系列的措施，大大加快了官僚垄断资本的集中和积聚，进一步提高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垄断程度。现在，生产联合公司已由六十年代的几家，增至一千五百多家。占企业总数百分之三的大型企业的产值，相当于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在农业中，利用所谓“庄际联合企业”和“农工综合体”等形式，进一步加强对农庄的控制和兼并。

正如列宁所说的：“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
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
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列宁选集》第2卷第
795页）经济上的集中和政治上的反动，这就决定了苏修必然
要加入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行列，拼命争夺世界上最重要的
原料来源、最有利的投资场所和商品销售市场，以及战
略要地。

一、争夺原料来源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缺乏，竞争和追
逐全世界原料来源的斗争愈尖锐，那末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
就愈激烈。”（《列宁选集》第2卷第802—803页）近年来，
苏修的一些主要原料和燃料生产的增长率，正在逐步下
降，而消费量却迅速增加；为了控制东欧一些国家，苏修不
得不供给它们一部分原料和燃料；苏修还要向西方国家输出

原料和燃料，以赚取外汇来弥补它对西方贸易的庞大赤字。因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愈来愈感到原料缺乏的威胁，急于夺取原料产地。

以石油为例，苏修的石油生产增长率，正在逐步下降。六十年代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但一九七〇年的增长率已降至百分之七点二，一九七一年再降至百分之七，一九七二年进一步降至百分之四点四。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苏联的石油产量都没有完成计划指标，共欠产一千多万吨。相反，苏联的石油消费量却迅速增加。据西方报道，从一九六六年
起，苏联的石油消费量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生产的增长速度。估计到一九八〇年，苏联的石油消费量将达六亿多吨，而石油产量将不会超过五亿六千万吨。此外，苏修还要向东欧一些国家输出石油，以便继续控制这些国家。据报道，东欧一些国家(罗马尼亚除外)生产的石油一般只能满足本国需要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其余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要仰赖于苏联。一九七〇年，东欧国家从苏联进口石油约四千万吨。以后，逐年上升，到一九七四年，已达六千七百万吨。为了赚取外汇，苏修还要向西方国家输出一部分石油。从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〇年，苏联对西方国家的石油输出额约三亿七千万公吨。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间，平均每年输出约四千七百万吨。由于以上原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日益感到石油的缺乏。它对于盛产石油的中东地区，不能不垂涎欲滴。

除了石油资源以外，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有色金属精矿、橡胶、棉花、黄麻以及其他战略资源，都想加以霸占，为自己所垄断。

在争夺石油和其他战略资源的同时，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还极力争夺粮食及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由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实行希特勒的“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国民经济日益军事化，农业和民用工业都很落后，造成国家市场供应紧张，粮食不足，日用必需品和食品奇缺，劳动人民怨声载道。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力图把别的国家变成苏联的粮食和主要生活资料的供应基地。

二、争夺投资场所

攫取垄断高额利润，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本性。在苏联国内，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把利润和盈利率作为“评价经营活动的最重要的标准”^①，鼓励和促使各个企业采取种种恶劣的手段，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损人利己，去夺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4页）因此，虽然苏联的农业还落后于工业，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下，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会把更多的资本用于改善农业的条件，用于改善劳动人民的处境，从而减少了利润。因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一方面要向西方国家乞讨贷款，一方面又把大量资本输到“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的国家里，《列

① 柯西金1966年8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关于内外政策的报告”。

宁选集》第2卷第783页)以榨取巨量的超额利润。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四大的总结报告中公然叫嚣：“看来还应考虑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要能够提高我国经济体系的各个环节从同兄弟国家发展长期经济联系中获得的利益。”这充分反映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外进行剥削和掠夺，追求超额利润的贪婪欲望。

为了争夺最有利的投资场所，苏美两霸展开了尖锐的斗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伪装成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同情者与支持者，竭力利用被压迫国家和民族反对美帝的斗争，利用美帝的日益衰落，乘虚而入，大挖美帝的墙脚，妄图“把全世界囊括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内”。(《列宁全集》第24卷第371页)

三、争夺商品销售市场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在苏联的一些企业和工业部门中，形成了一部分商品大量积压的现象。这些商品，质量低劣，价格奇昂，在西方市场上是很难找到销路的。据苏修报刊透露：在一九七二年的机器设备出口总额中，向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额仅占百分之三左右^①。因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急于夺取商品销售市场，以便把这些积压商品推销出去。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不仅要争夺一般商品的销售市场，而

① [苏]修《对外贸易》杂志1973年第7期。

且还要为高价销售陈旧军火寻找销路。多年来，苏修叛徒集团一面弹唱什么“裁减军费”以“援助发展中的国家”的高调，一面却大量增加军费，拼命发展军事工业，疯狂扩军备战。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的军费开支，接连两次突破苏联历史上军费的最高纪录，达到一百七十九亿卢布（约折合二百亿美元）。总计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三年九年间，苏联国防费用的绝对增长额，等于赫鲁晓夫当政时期绝对增长额的两倍。而且实际的军费开支远远超过了苏修官方公布的数字。根据各方面的材料计算，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苏修每年的实际军费开支已达八百亿到一千亿美元。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约相当于美国的一半略多，而实际军费开支却超过了美国。随着军事费用的螺旋上升，军事工业的恶性膨胀，堆积了大批剩余的和从部队替换下来的废旧军火。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必然要为这些废旧军火夺取有利的销售市场。

四、争夺战略要地

除了上述的经济原因之外，还有政治上、军事上的原因，促使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加紧进行侵略扩张。苏修为了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拼命抢夺战略要地。它的野心很大，把魔手伸向世界各地。欧洲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因此，苏美两霸都把欧洲作为争夺的重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声东击西。它极力加强对东欧一些国家的控制，并力图分化瓦解西欧，排挤美国势力。中东地处欧洲的南翼，是欧、亚、非的咽喉，因而它是苏美两霸必争之

地。苏修要尽一切阴谋手段，企图控制一些阿拉伯国家，霸占中东的石油和战略要地。苏修继承了老沙皇南下政策的反动衣钵，胃口比老沙皇还大，加紧在波斯湾地区和南亚次大陆进行颠覆和扩张活动，企图进一步控制这一地区，以打通从黑海、地中海、红海，经印度洋，出西太平洋到日本海的一条连接欧、亚、非三洲的弧形通道。苏修叛徒集团妄图建立一个比老沙皇更大的称霸全世界的大帝国。

列宁指出：“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来源、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以及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等等的动机。”（《列宁选集》第2卷第841页）这些殖民主义的动机，是苏修推行的穷凶极恶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出发点，也是苏修对外“援助”的出发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从这些肮脏的动机出发，把对外“援助”作为剥削和掠夺别国，争霸世界的重要手段。它向受“援”国提供“援助”，完全是为了要把一条殖民主义的锁链套在受“援”国的脖子上，任凭苏修去掠夺资源、倾销商品、榨取超额利润，使受“援”国变成苏修大帝国的殖民地。

第二节 苏“援”在世界各地的分配

苏修的对外“援助”，主要有“军事援助”和“经济技术援助”两种。所谓“军事援助”，包括：向受“援”国推销陈旧和报废武器，派出大批“军事顾问”，控制受“援”国的军队和军事机构，甚至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所谓

“经济技术援助”，包括：提供“发展计划贷款”和“商业贷款”，派出苏修“专家”，把持受“援”国的建设项目和资源的勘探、设计、施工、开采权，等等。近年来，苏修为了进一步在经济上进行掠夺，在政治上进行干涉，仿效西方帝国主义搞“跨国公司”的办法，打着“援助”的幌子，直接向别国投资，办“合股企业”，建立“国中之国”。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七三年第八期提出，要把“办合股企业”这种形式“提到首位”。苏修的这种“合股企业”，现已到处出现。以上各种“援助”，名目虽有不同，但都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对外掠夺和扩张。哪一种形式更有利于对外掠夺和扩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就利用哪一种形式。

随着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外掠夺和扩张步伐的加快，苏修对外“援助”的范围也日益扩大，遍及世界各大洲。

一、苏修对“经互会”一些成员国的“援助”

自从苏修叛徒集团把苏联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以后，便将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古巴变作自己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利用“经互会”、“华沙条约组织”等工具，进行新殖民主义的统治。

列宁指出：“在殖民地市场上，更容易（有时甚至只有在殖民地市场上才可能）用垄断的手段排除竞争者，保证由自己来供应，巩固相当的‘联系’等等。”（《列宁选集》第2卷第804页）因为“经互会”一些成员国处于苏修的新殖民统治之下，更便于苏修进行最残酷的剥削和掠夺；同时，苏修为了同美帝争夺欧洲，要进一步加强对东欧一些国家的控

制，因此，苏修在向世界各地进行疯狂渗透的同时，把“经互会”一些成员国作为资本输出的重点。

据不完全的统计，至一九七六年年初，苏修向“经互会”国家提供的“贷款”已经超过一百多亿卢布。苏修报刊透露，截至一九七五年末，“经互会”国家由苏修“援”建并已投产的工业项目就有六百九十六个^①。

由于苏修把大量资本输出到东欧一些国家，因而使这些国家的外债负担日益沉重，越来越依附于苏修。保加利亚是欠苏修债款最多的东欧国家。截至一九七一年初，保加利亚从苏修取得的“贷款”共达二十一亿五千万卢布，约合二十三亿九千万美元。一九七一年，又签订了新的贷款协定。这个协定规定，从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保加利亚从苏修取得约五亿卢布的贷款。在保加利亚的外债总额中，苏修的“贷款”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苏修还把大量的“贷款”，投入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苏修还通过“军援”的形式，向东欧一些国家大搞军火输出。据西方报刊估计，在一九六一至一九七一年十个财政年度中，苏修平均每年向华沙条约成员国投放“军援”约五亿美元^②。

蒙古是一个只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国家。但到一九七〇年为止，苏修投入蒙古的“贷款”已超过十六亿美元。据美国

① [苏]《经济报》1976年第25期

② 纽约时报新闻社纽约1974年3月22日电。

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出版的《苏联七十年代 经济展望》统计，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苏修又先后向蒙古投入一亿美元和一亿二千万美元两笔“经济援助”。到一九七二年底，苏修对蒙古的“贷款”总数已经超过十八亿美元。

古巴是在一九七二年被拉入“经互会”的。苏修为了加强自己在古巴的垄断地位，从一九六〇年开始，投放了大量的“经援”和“军援”。据西方报刊估计，到一九七二年初，古巴欠苏修的外债超过了四十亿美元^①。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个古巴人欠苏修债款将达五百美元。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承认，他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访苏时，同苏修签订了五项协定，其中规定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苏修再向古巴投放一笔“贷款”，以填补苏古贸易的赤字。此外，还投放三亿卢布的“贷款”，以“开发”古巴的镍——钴矿和其他重要资源^②。为了把古巴变成苏修向西半球侵略和扩张的军事基地，到一九七一年止，苏修向古巴投放了达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③。

十多年来，苏修向“经互会”成员国投入的“援助”，是十分庞大的。这些“援助”，象层层的密网一样，缠绕着“经互会”成员国，加强了苏修对这些国家的殖民统治。

① [英]《拉丁美洲》周刊1973年1月12日，《国际清算银行报刊汇编》1972年2月24日。

② 法新社哈瓦那1973年1月3日电。

③ [美]《华盛顿邮报》1972年9月4日。

二、苏修对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援助”

苏修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幌子，冒充第三世界的“朋友”，向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和扩张。从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起，苏修开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最初接受苏修“援助”的是印度和阿富汗。以后，苏修到处伸手，被“援助”的国家急剧增加，一九六〇年达十四国，到一九七〇年初已达三十九国。目前，被“援助”的国家已有六十多个。据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出版的《苏联七十年代经济展望》估计，从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七二年，苏修已向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提供了一百六十七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军事援助”约八十五亿美元，“经济援助”约八十二亿美元（见表1和表2）。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苏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经援”，共达十七亿美元^①，一九七五年，提供了十三亿多美元^②。苏修妄图借此把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一）对中东地区的“援助”。

中东具有世界已知的石油蕴藏量百分之七十的丰富资源。战略地位又十分重要。从苏修在黑海的各港口进入印度洋的航道，除了绕道好望角以外，都要通过中东。苏修为了争夺中东的石油和战略要地，向中东地区输出了大量资本。

① 欧洲经济与发展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评论》1975年。

② [英]《苏联问题分析家》1976年4月22日。

在中东地区中，埃及曾经是苏修的首要投资场所。苏修首先通过“军事援助”，然后，又在经济、政治等方面进行渗透。到一九七二年止，苏修对埃及的“军事援助”为二十六亿八千五百万美元，占第三世界接受苏修“军援”各国的第一位；“经济援助”为十一亿九千八百万美元，在第三世界接受苏修“经援”的各国中，仅次于印度而居第二位。据苏修驻埃及大使馆参赞 H·A·洛帕京透露，苏修通过所谓“援助”，插手埃及的一百零六個项目的建设工程。到一九七六年年初，埃及欠苏债务达六十五亿八千万美元。苏修对伊拉克的“经济援助”，在最近几年有急剧增加。到一九六四年止，苏修以“经援”形式向伊拉克输出资本为一亿八千四百万美元。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二年期间，增加了三倍，达五亿四千九百万美元。仅为“开发”伊拉克的北鲁迈拉油田，一下子便投入二亿美元的“援助”。苏修还向伊拉克投入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加强了对伊拉克的军事控制。苏修为了控制伊朗的天然气和石油资源，向伊朗投入了五亿六千二百万美元的“经援”和四亿八千万美元的“军援”，插手了九十多个项目的建设工程。其中有横贯伊朗的干线瓦斯管道、阿拉克机器厂、伊斯法罕钢铁厂、阿拉斯河上的水利枢纽与水坝等。对于叙利亚和土耳其等国，苏修都投入大量的“经援”和“军援”，极力进行渗透。最近，苏修力图利用美土矛盾，分化瓦解北约南翼，进一步控制巴尔干地区，因而加紧向土耳其渗透。一九七五年，当土耳其政府因美国国会决定停止对土“军援”和禁止向土出售武器，而宣布接管美在土的一切军事基地和设施以后，苏修立即与土签订新

的“经济合作协定”，提供七亿美元“贷款”。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苏修头目柯西金再次窜到土耳其进行活动，还允诺再提供一亿五千万美元“贷款”，使苏“援”总额达十四亿美元之巨。

（二）对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援助”。

南亚和东南亚，是“许多世纪以来，沙皇政府一直想夺取”的地方。（《列宁全集》第23卷第125页）苏修新沙皇步老沙皇的后尘，继续“扮演亚洲宪兵的角色”。（《列宁全集》第15卷第201页）它乘美帝日益衰落之机，拼命挤入这一地区，扩张自己的殖民势力；并且极力勾结这一地区的反动势力，拼凑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企图建立一个反华包围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打着“援助”的幌子，对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大肆进行渗透。

南亚地区，是苏修对第三世界输出资本的另一个重要投放场所。到一九七二年止，苏修以“经援”形式，向南亚投放了三十亿零二千五百万美元，占苏修对第三世界“经援”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九。苏修还对南亚投入了大量的“军援”，仅对印度和阿富汗两个国家的“军援”，就达十六亿七千五百万美元，占苏修对第三世界“军援”总额的百分之二十。

在南亚地区，印度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输出资本的主要对象。到一九七二年止，印度取得苏修的“经济援助”近十六亿美元，不仅在南亚地区接受苏“援”的国家中占第一位，而且在第三世界接受苏“援”的国家中也占第一位。据塔斯社报道，一九七三年，在勃列日涅夫访印期间，签订了

表 1

苏维对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经济援助”

(单位: 百万美元)

投 放 国 家	1954—1972年		其					中			
	合 计	比 重 %	1954— 1964年	1965年	1966年	1967年	1968年	1969年	1970年	1971年	1972年
总 额	8,196	100	3,794	416	1,214	269	374	462	194	262	581
中 东	3,336	40.7	1,429	84	422	200	178	287	76	418	242
埃及及朋	1,198		1,002	—	—	—	—	—	196	—	—
伊 拉 克	562		41	—	289	—	178	—	54	—	—
土 耳 其	549		184	—	—	—	—	—	121	22	222
叙 利 亚	534		10	—	—	200	—	166	—	—	158
阿 拉 伯 也	317		100	—	133	—	—	—	—	—	84
门 共 和 国	92		92	—	—	—	—	—	—	—	—
希 腊	84		—	84	—	—	—	—	—	—	—
南 亚	3,025	36.9	1,444	286	656	5	194	20	11	214	135
印 度	1,593		797	225	571	—	—	—	—	—	—
阿 富 汗	826		553	11	1	5	127	—	3	5	121
巴 基 斯 坦	474		44	50	84	—	67	20	—	209	—
孟 加 拉	74		—	—	—	—	—	—	—	—	74
斯 里 兰 卡	38		30	—	—	—	—	—	—	—	—
尼 泊 尔	20		20	—	—	—	—	—	—	—	—

古巴除外。

资料来源：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出版的《苏联七十年代经济发展》。

表 2 苏修对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军事援助”

(单位：百万美元)

投 放 国 家	1955—1972年合计	比 重 %
总 额	8,475	100
埃 及	2,685	31.7
印 度	1,220	14.4
印 尼	1,100	13.0
伊 拉 克	1,000	11.8
叙 利 亚	715	8.4
伊 朗	480	5.7
阿 富 汗	455	5.4
阿尔及利亚	395	4.6
其 他	425	5.0

资料来源：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出版的《苏联七十年代经济展望》。所谓“进一步发展苏联和印度的经济和贸易合作的协定”。这个协定规定，苏修向印度提供“发展工业和农业的贷款”，以进行年产七百万吨钢的比莱钢铁厂和年产一千万吨钢的波卡罗钢铁厂的扩建，并插手年产六百万吨石油的马图拉炼油厂，以及马拉杰汉铜矿选铜综合企业、加尔各答地下铁道和其他项目的建设①。苏修还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支持印度反动派挑起中印边界争端，策动了肢解巴基斯坦的侵略战争。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二年期间，苏修向印度投放“军援”共十二亿二千万美元。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在一九七三年勃列日涅夫访印时，苏印达成一项协议，在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间，苏修向印度提供款额

① 塔斯社德里1973年11月30日电。

为二十亿卢布的“军事援助”^①。此外，苏修还派了大批“军事顾问”到印度去，直接控制和操纵印度的军队和军事机构。

阿富汗是第三世界第一个接受苏“援”的国家。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七二年，苏修投入阿富汗的“经济援助”共八亿二千六百万美元。在波德戈尔内访阿时，又达成一亿二千万美元的贷款协定^②。苏修投入的“贷款”，已超过了阿富汗年度预算的八倍，比美帝提供的“发展援助”多三倍，在阿富汗的第二、三、四个五年计划中，居于外“援”国的首位。苏修通过所谓“援助”，铺设了一条把阿富汗北部的天然气输入苏联的管道，开辟了一条从莫斯科至喀布尔的无线电通话线路，建成两条连接苏联边境直通巴基斯坦和伊朗的战略公路，进一步加强了对阿富汗的剥削和控制。苏修在阿富汗的武装部队中投下了很大的本钱，到一九七二年，共投放“军援”四亿五千五百万美元。

对于东南亚地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怀有狂妄的野心。仅对印度尼西亚一国，苏修便投入了十一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对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反动政权）、缅甸三个东南亚国家，投入“经援”已超过一亿五千万美元。一九七三年以来，出现了苏修加紧向印度尼西亚渗透的动向。

（三）对非洲的“援助”。

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沉重打击下，西方帝国主义为保持它们在非洲的利益而拼命挣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趁机打

① 共同社新德里1973年12月1日电。

② 合众国际社1973年5月22日电。

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幌子，极力向非洲渗透。它通过所谓“经援”和“军援”，在一些国家进行控制、干涉和掠夺活动，同美帝国主义争夺势力范围。

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二年，苏修向非洲国家投入了总额为十二亿三千六百万美元的“经济援助”。由于阿尔及利亚具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战略地位又十分重要，因此，苏修对阿尔及利亚投入的“经援”也最多，超过四亿二千万美元。几内亚具有丰富的铝土和其他矿藏资源，是苏修进行掠夺和剥削的重要对象。苏修投入几内亚的“经援”共二亿六千万美元，在非洲的受“援”国中占第二位。仅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签订的协定，苏修为在几内亚的金迪亚建立开采铝土矿的公司就投资八千三百万卢布（合九千二百万美元）。对于其他非洲国家，苏修也都千方百计地进行渗透。到一九七五年末，苏修向非洲投入的“经援”总额，已达二十亿美元。

近年来，苏修投入非洲的“军事援助”有较大的增长。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四年，苏联向非洲提供武器六千九百二十万美元，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九年为一亿五千七百六十万美元，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七^①。至一九七一年止，苏修向非洲国家共投放“军援”七亿美元^②。其中，阿尔及利亚占了一半左右。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二年，苏修共向阿尔及利亚投放“军援”三亿九千五百万美元。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安哥拉实现了独立。苏修急于夺得对南部非洲和南大西洋

①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对第三世界的军火贸易》。

② 《纽约时报》1972年11月19日。

的控制权，迫不及待地把它的黑手伸进安哥拉。除了实行赤裸裸的军事干涉以外，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向安哥拉提供用于支一派、打两派的武器，大约有五亿美元。此外，苏修对苏丹、索马里等国，都投入了大量的“军援”。

（四）对拉丁美洲的“援助”。

拉丁美洲的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引起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觊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伪装“支持”拉美国家反对美帝的斗争，在拉美地区插上一脚，极力进行渗透和扩张。

除古巴以外，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二年，苏修对智利、巴西等近十个国家先后投入四亿四千五百万美元的“经援”。其中，智利占了一半多，共二亿三千五百万美元。一九七三年四月，苏修驻智利大使巴索夫透露，莫斯科已批准给智利一亿一千五百万美元的“经济援助”^①。这样，苏修对智利的“经援”就达三亿五千万美元。到一九七二年止，苏修共向巴西投放了八千五百万美元的“经援”。以后，据阿通社报道，苏修又提供二亿美元的“贷款”，来“开发”原先由美国垄断公司控制的帕拉伊巴河流域的沥青资源，还提供一千二百万美元在卡皮瓦里兴建工程，并且对巴西的冶金、化学和运输方面进行投资。苏修还对巴西投放大量“军援”，用来购买杰克——40飞机。一九七四年以后，阿根廷成为苏修对拉美国家提供“经援”的一个重点对象。在一九七四年二月，苏修同阿签订了三项协议，答应提供一亿美元的“贷款”。同年五月，苏邀请阿经济代表团访苏，确定把

① 合众国际社圣地亚哥1973年4月6日电。

“贷款”增至六亿美元。为了掠夺玻利维亚的资源，苏修不惜向实际上为美国垄断资本家所经营的玻利维亚公司提供“贷款”^①。

第三节 苏修对外“援助”的特点

列宁指出：研究帝国主义的“国外投资究竟在各国之间怎样分配，究竟投在什么地方”，“足以说明现代帝国主义的某些一般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列宁选集》第2卷第785页）从苏“援”在世界各地的分配状况中，可以看出，苏修对外“援助”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服务于它所奉行的反革命全球战略，致力于建立一个苏修大帝国。

苏修把东欧一些国家作为同美帝争夺欧洲的桥头堡。为了巩固对这些国家的控制，苏修通过“经援”、“军援”等形式，向这些国家大量输出资本。十多年来，苏修对这些国家的“援助”总额远远超过了对亚、非、拉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古巴、蒙古等国除外）的“援助”总额。

为了争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意义的中东地区，苏修把中东地区作为仅次于东欧的另一个“援助”重点。在苏修对第三世界一些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总额中，中东地区占了百分之四十点七。仅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等四个中东产油国的“军事援助”，就占了苏修对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军事援助”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七点六，比同时期苏修投入第三世界任何地区的“援助”都要多。这反映出

① 阿通社地拉那1973年7月28日电。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急于挤入中东地区的欲望。②

苏修怀着不可告人的祸心，加紧向其近邻国家进行渗透和扩张。从苏修投放的“经济援助”来看，印度近二十亿美元，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几乎都近十亿美元。苏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谢苗·斯卡奇科夫声称：苏联注意“同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这些近邻国家积极进行‘合作’，这有助于同他们发展良好的睦邻关系。”①他们的所谓“合作”和“睦邻关系”，都是一些骗人的幌子。苏修打出这些幌子，妄图蒙蔽别国的视听，使它们失去警惕，以便把这些国家置于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

近年来，苏修以显著加快的速度，向原被称为“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进行渗透。在赫鲁晓夫时期，除古巴以外，苏修只向阿根廷提供小额的“经援”。但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二年间，已先后向近十个拉美国家提供四亿四千五百万美元的“经援”，比赫鲁晓夫时期增加了十五倍。在智利的阿连德政权被推翻之后，苏修又大肆向阿根廷渗透。仅一九七四年，便向阿根廷提供六亿美元的“援助”。这反映了两个超级大国角逐势力范围的斗争愈来愈尖锐。

以上情况说明，苏修怎样分配它的对外“援助”，是同它的反革命全球战略完全相适应的。苏修对那个地区那个国家投放较多的“援助”，正说明它对那个地区那个国家抱有更大的野心。苏“援”在世界各地的分配状况，为人们勾划出苏修梦想建立那个横跨欧、亚、非、拉的大帝国的版图。

① 塔斯社莫斯科1973年8月22日电。

苏修对外“援助”的第二个特点是，近年来大幅度增加“军事援助”的规模，加紧准备和阴谋挑动帝国主义战争。

据瑞典官方研究机构的材料，苏修向亚、非、拉国家出售军火的数量，由五十年代后期占世界军火出售量的百分之十一点三猛增至七十年代初期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近几年来，出现了“军援”比重逐步上升，“经援”比重逐步下降的趋势。例如，一九六六年，苏修对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经援”达十二亿四千万美元，军火出口不过三至四亿美元；到一九七〇年，以“军事援助”名义输出军火达八亿美元，“经济援助”却下降至二亿美元左右；一九七二年，苏修向第三世界出售军火十一亿美元，而“经济援助”仅为五亿八千万美元。一九七三年，仅在中东“十月战争”期间，苏修向中东国家出售军火总额就达七亿英镑（约合十六亿美元）。近五年来，苏修向十个非洲国家共提供了近三十亿美元的“援助”，其中：二十二亿美元用于“军援”，七亿六千五百万美元用于“经援”^①。

这一个特点说明，在国内，苏修拼命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把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到军火生产上；在国外，苏修加紧进行军事扩张，而且，袭用了老牌帝国主义惯用的办法，自己出军火，别人出炮灰，把别国人民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为苏修争夺霸权而卖命。

苏修对外“援助”的第三个特点是，实行赤裸裸的社会沙文主义原则。

① [西德]《世界报》1976年1月30日。

苏修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事实上的沙文主义者”。它的对外“援助”，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实行“掠夺别的国家，奴役别的民族”的沙文主义原则。

（《列宁全集》第22卷第101页）

苏修提供的“援助”，都附有十分苛刻的经济、政治、军事条件。而且，利息较高，还款期限较短，还经常乘人之危，趁机逼债。它的各种“贷款”，都是不兑换的卢布，规定必须用于购买苏联的陈旧设备，并且要用苏修指定的外汇或重要物资，例如石油、天然气、铝矾土、棉花等来偿还。苏修派到受“援”国的专家，不仅要索取高额的工资，而且还强迫受“援”国给予种种特权和享受，实际上是对受“援”国的变相剥削。

在苏“援”中，也有极小的一部分是所谓“赠与”的。但正如毛主席所揭露过的美“援”那样：“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384页）苏修的所谓“赠与”，同样是有条件的，就是跟着苏修的指挥棒走，充当苏修的工具。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同别国达成“援助”协议之后，从牟取暴利出发，经常不讲信义，单方面地违背或撕毁协议。它或者是拖延付款，借此敲诈勒索；或者是说了话不算，拉倒了事。因此，苏修对外“援助”的议定额同实际支付额，相差很大。据〔美〕沃尔德马·A·尼尔森著的《大国与非洲》一书的估计，在世界范围，实际到期支付的不到百分之四十。非洲的实际支付情况就更差，以埃塞俄比亚为例，苏修答应提供“贷款”一亿零二百万美元，实际只支付了二千

九百万美元。〔美〕詹姆斯·理查德·卡特在《苏联对外援助净成本》一书中，计算出苏修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八年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的实际支付额，共三十一亿零一百万美元（包括“赠与”部分），而同时期的“援助”议定额共六十二亿九千六百万美元，前者不到后者的百分之五十。西方的其他一些人也认为，苏修对外“援助”的实际支付额，大约不超过其议定额的一半左右。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一直吹嘘它的对外“援助”，是什么“无私”的，“完全平等”的，“不抱有任何政治、军事及其他自私目的”的。然而，正如列宁所说的：“在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情况：那个叫喊得最凶的和发誓发得最厉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的人。”（《列宁全集》第20卷第294页）上述的特点足以证明，苏修的对外“援助”，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扩张势力范围的需要，是为了大规模地剥削和掠夺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需要，是为了一个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追逐垄断高额利润的需要。一句话，它是抱有最自私、最卑鄙、最凶恶的目的的。人们不禁想起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一番话，他说：“美国援助其他国家的动机，主要不是为了它们的利益，而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否则我们不会给他们援助。”杜勒斯早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去了，但他的这一番话，却被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奉为对外“援助”的准则，而且做得十分彻底。苏“援”和美“援”都是一路货色，只不过是多了一块“社会主义”招牌，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同当年的杜勒斯相比，苏修叛徒集团可谓毫无逊色了。

第二章 苏修利用“援助” 进行剥削和掠夺

为了实现资本的最大限度的增殖，苏修叛徒集团公然把“获得经济利益”作为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柯西金在苏修二十四大关于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中宣称：“对外经济联系”，必须从“整个国民经济的效果出发”。这个所谓“整个国民经济的效果”，在苏联《政治自修》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六期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它说：苏联“对外经济联系的国民经济效果的标准”，是“在花费一定数量的资金与人力的情况下，是节约了还是损失了社会劳动，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国民收入。”文章还说：“苏联……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可以使苏联大大增加机器制造业产品（我国现在具备生产这些产品的良好条件）的出口和经济上有利的原料、食品和制成品的进口（用来偿还贷款和支付贷款的利息）。”文章反复告诉读者，苏联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为了“出口生产条件优越的产品和进口自己生产需要更多花费的商品而获得经济利益。”它所说的“出口生产条件优越的产品”，实际上，就是要向受“援”国推销傻大粗笨的机器设备和陈旧过时的军火；它所说的“进口自己生产需要更多花费的商品”，就是要掠夺受“援”国廉价的原料和各种物资；它所说的“节约社会劳动”和“增加国民收入”，就是要攫取大量的超额利润。总之，他们的“无

私援助”全是为了做买卖，赚大钱，为了剥削和掠夺，其实质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输出。正如科威特《舆论报》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苏联人’现在不再用以前（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诡计了，而使用‘支持’和‘援助’的方法来掠夺二十世纪的人民”了。

第一节 残酷掠夺重要资源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经常利用“债主”的地位，强迫受“援”国用它指定的原料或产品来偿还“贷款”。借此，贪婪地掠夺受“援”国的重要原料和物资。根据多方面的统计资料和报道，苏修向受“援”国掠夺的物资，主要有：一、矿藏资源；二、农副产品；三、工业消费品。

一、大量掠夺矿藏资源

（一）石油和天然气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大量掠夺和急于控制的重要资源。

长期以来，中东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美、英、荷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东都有巨大的石油投资，垄断着中东石油的开采和销售。苏修为了争夺和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以“援助”为先导，逐步向中东地区扩张，把黑手伸向中东各国。五十年代末期，苏修利用阿拉伯人民反对美英势力的时机，开始插足中东。近年来，又利用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打着“支持”阿拉伯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旗号，先后同一些中东国家签订了种种所谓“援助”和“共同开发”协定，强制规定这些国家要用石油和天然气来偿还

“贷款”，并取得了一些国家石油资源的调查、勘探和开发权。

伊拉克是苏修通过“援助”攫取大量石油的主要国家之一。一九六一年，伊拉克政府收回了西方石油资本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租借地。一九七二年六月，又进而对垄断着伊拉克石油生产的、由英美大石油公司控制的“伊拉克石油公司”的全部设施实行国有化。苏修乘机而入，打着“支持”伊拉克国有化措施的幌子，把黑手伸进了伊拉克。它先后以“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的形式，取得了伊拉克南部北鲁迈拉油田（蕴藏量达十三亿八千万吨）和哈尔德油田的开采权。据美国官方统计，截止一九七二年，苏修对伊拉克的“经援”已达五亿四千九百万美元。除了大部分用于北鲁迈拉油田以外，其余则主要用于“援”建一个炼油厂和敷设输油管。苏修的这些“贷款”，伊拉克主要以石油来偿还，并使用新敷设的输油管直接输往苏联。

近年来，苏修从伊拉克掠夺的石油数量急剧上升，一九七一年，从伊拉克输往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石油共计六十五万吨^①，一九七二年仅输往苏联就达到了四百万吨^②。苏联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在一篇文章中供认：“一九七三年我们购进的伊拉克石油还将显著增加”。

伊朗是苏修攫取大量石油和天然气的另一个受“援”国。一九六六年，伊朗国王访苏时，同苏修签订了一项由苏修给伊朗贷款“援”建伊斯法罕钢铁厂，而由伊朗向苏修出

① [英]《石油新闻社》1972年5月号。

② 法新社莫斯科1973年8月9日电。

口天然气偿还“贷款”的协议。另外，苏修又“贷款”一亿五千万美元，“援助”伊朗修建从伊朗南方的阿加贾利和马伦油田通往北部伊苏边界的阿斯塔拉的天然气输送管道。伊朗将通过这条输气管向苏修输送天然气。一九七〇年这条管道的第一期工程完工之后，每年可输送八十亿立方米天然气，其中就把六十亿立方米输给了苏修。当第二阶段工程于一九七三年开始以后，它的输气能力增加到每年一百六十亿立方米，其中一百亿立方米是供给苏修的^①。

一九七二年八月，伊朗经济大臣访苏时，又商定了一些苏“援”项目，其中包括对伊朗东北部霍腊散地区巨大的天然气田进行联合勘察。所谓“联合勘察”，实际上不过是苏修攫取伊朗自然资源勘察权的一个幌子，它插手霍腊散地区的勘察工作，无非是为更大规模地攫取伊朗天然气资源作准备。

伊朗向苏修及其“大家庭”其他成员提供石油的数量，据英国《石油新闻社》的估计，一九七〇年为三百三十万吨，一九七一年为三百六十万吨^②。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据估计都超过这个数字。这些石油都是按规定用来偿还苏修“贷款”的。

此外，苏修掠夺石油和天然气的魔爪也伸向了其他中东国家。埃及西瓦绿洲地区的石油勘探和开采权已被苏修霸占。苏修几乎是埃及石油的唯一出口对象。据埃及报刊统

① 新华社德黑兰1972年7月30日电。

② [英]《石油新闻社》1972年5月号。

计，到一九七三年，苏修已从埃及掠夺了四百八十万砘石油^①。近几年来，埃及的石油生产增长较快，到一九七五年，比一九七二年的年产增长近三倍，约有四千万砘可供出口。

叙利亚的采油业，一开始就处在苏修的操纵之下。苏修采取“合作开采”的手段，派出大量“顾问”和“专家”，对叙利亚的石油生产进行全面控制。叙利亚东部蕴藏量达十四亿吨的大油田于一九六八年始开采，一九七〇年起，已向苏修输出大量石油。

总之，苏修对中东地区各产油国，到处伸手，力图进行渗透，其目的就在于同美国争夺这个盛产石油的地区。

苏修用“援助”打开通路以后，从中东地区掠夺的石油数量迅速增加。一九六七年，苏修购买中东的石油只有十万吨，到一九七一年已达七百五十万吨，一九七二年高达一千一百九十万砘^②。据报道，一九七三年苏修原计划从中东进口石油二千万砘，后因叙利亚的巴尼阿斯和塔尔图斯港口设备，在中东“十月战争”中遭到相当严重的破坏（伊拉克的出口石油通过这两个港口来输送），影响了这个指标的完成^③。据西方估计，到一九七五年，苏修和东欧国家利用逼债和其他形式从中东国家获得的石油，达三千五百万砘，到一九八〇年可能达到一亿吨。

苏修为了进一步掠夺和控制中东石油，竟无耻地制造了中东石油是“国际财产”的谬论。苏修头目对一位访问莫斯

① [埃]《金字塔经济》1975年4月1日。

② [日]《朝日新闻》1973年12月25日。

③ [英]《外事报道》1974年1月24日。

科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说：“尽管阿拉伯石油在形式上是阿拉伯财产，但实际上也是国际财产”。这真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强盗语言。科威特《舆论报》指出：“俄国人抛出了石油——特别是阿拉伯石油——是国际财产的口号，这是新的概念，是最新的帝国主义逻辑。”

除中东以外，苏修还极力掠夺和控制其他地区一些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

对阿富汗的天然气，苏修觊觎已久。苏修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对阿富汗进行“援助”。到一九七二年止，苏修向阿富汗提供了八亿多美元的经济“援助”^①，苏修已成为阿富汗最大的债主。为了掠夺阿富汗的天然气，一九六三年十月，苏修以“援助”为名，在阿富汗铺设直通苏联边境的天然气输气管道。现在已经使用的有从兴都库什区的希巴甘到苏联边境和从阿姆河克利夫港到苏联的两条管道。在一九六三年的协定中规定，阿富汗每年将把生产的天然气的百分之七十五供给苏修，其中三分之二用于偿还苏修“贷款”。一九六七年苏阿签订的另一项协议又规定，自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八五年，阿富汗要向苏修提供六百亿立方米天然气。据苏修报刊透露，从一九六七年十月至一九七四年末，苏修从阿富汗获得的天然气，已达一百七十多亿立方米^②。目前，天然气的出口，已成为阿向苏出口项目的首位。用苏“援”开发的阿富汗天然气，实际上已成为苏联天然气网的一个组成部分。

①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出版的《苏联七十年代经济展望》。

② [苏]《对外贸易》杂志1975年第10期。

在印度，苏修通过“援”建巴罗尼和科亚利两个石油加工厂，控制了印度百分之六十的炼油工业。最近又进一步把黑手伸进了印度石油的勘探领域。据印度《祖国报》的文章说：“苏联在印度石油工业中占据统治地位后，急于保住这一地位”。在勘探孟买沿海储油结构问题上，“苏联一方面承认自己技术力量不足，另一方面又不让其他国家来干这项工作，压印度政府放慢步伐，等苏联在今后几年内有能力满足印度的技术需要时再说。”①

巴西的帕拉伊巴河谷的沥青片岩矿藏，其蕴藏量占世界蕴藏量的百分之八十，所能提供的石油潜在储量达一千多亿吨。为了控制这些石油资源，苏修已给巴西大量“贷款”，其中用于这方面的直接投资已达一亿五千万美元。据透露，预定全部投资将达五亿五千万美元。

(二) 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其他地下资源，都是苏修掠夺的对象。

为了攫取大量的铝矾土，苏修打着“打破西方国家在几内亚开采铝土的垄断权”的旗号，在一九六九年签订了“援助”几内亚在金迪亚地区建立开采铝土公司的协定，苏修对此出资九千二百万美元。苏修“援”建的金迪亚地区铝土矿已在一九七三年末投产。一九七二年，苏修已从几内亚进口铝矾土三十三万吨，在苏“援”铝土矿建成后，苏修从几内亚进口铝矾土的数量将大幅度增加。根据苏修规定的“贷款”

① [印]《祖国报》1973年11月26日。

条件，几内亚在十二年或更多的时间内，必须用全部或大部分产品抵偿“债款”，在以后的三十年中，每年还要向苏修提供二百五十万吨高质铝矾土。苏修对几内亚的这个铝土矿，不仅提供了“贷款”，而且派去了“专家”，事实上，已掌握了这个矿的控制权。

匈牙利的铝矾土蕴藏量，占“经互会”各国已查明的铝矾土蕴藏量的百分之九十一。这些铝矾土，根据“国际分工”的原则，不准匈牙利自己用来炼铝，而必须全部运往苏联，由苏修加工成铝锭后，再卖给匈牙利。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二年的八年中，苏修从匈牙利掠夺去的氧化铝达一百零八万四千多吨。匈牙利的铀矿早已被苏修所控制，在苏修的严格监视下开采，匈牙利连过问的权力都没有。

在捷克斯洛伐克，普什布拉姆矿以及日加尔和吉什诺夫之间的矿山开采的铀，十分之九都被苏修掠夺去，十分之一的低价值的矿留给捷克。苏修今天的五分之一的铀的需要量，都是靠掠夺捷克来满足的^①。苏修还纠集了大量“专家”，正在集中精力研究“蒙古境内地质结构和矿物分布的规律”，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共同利用铜、锡、钨、钼等矿藏的前景上”^②。经过勘察，在蒙古北部布尔干省的额尔登丁敖包地方发现了一个铜、钼矿，属世界大铜矿之一，苏修为了全面控制这个矿的开采，强制蒙古签订了“经济与技术合作”协定，并成立了一个实际上完全由苏修出资的“蒙苏合营额尔

① [西德]《总汇报》1974年8月21日。

② 塔斯社乌兰巴托1974年2月10日电。

登丁敖包选矿厂”；此外，还从苏联境内直接向这座矿山供应电力，以直接控制这个矿的动力命脉。现在这个苏蒙“合作”的额尔登丁敖包铜、钼矿已经开发，蒙古将在二十年内以该矿产品还清苏修的“贷款”。苏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一个司长发表文章说，这个矿投产后，“将使苏联需要的铜的相当一部分得到供应”。除了额尔登丁敖包铜、钼矿，苏修还通过由它控制的“蒙苏有色冶金联合公司”，在色楞格省的陶勒盖图地区开发新的金矿；在贝尔赫地区大量开发萤石。蒙古开采的萤石，全部都运往苏联，其数量占苏联萤石进口总量的百分之五十。蒙古历年来开采的钨砂，也绝大部分被苏修所掠走。总之，蒙古的矿藏资源已完全为苏修所霸占。

印度的云母、铁矿砂，伊朗的锌、铅等有色金属精矿石，拉美一些国家的铜、锡、锌、锰等有色金属矿产，都被大量运往苏联。制造涡轮叶片的重要原料钛矿砂，苏修每年从埃及进口量达十万吨。古巴的镍蕴藏量占世界已知镍蕴藏量的百分之四十。为了攫取这一丰富资源，苏修对古巴提供的“援助”，除用于糖业生产外，主要是用在镍的生产上。

在阿连德执政期间，苏修从智利进口铜的数量迅速增加。一九七二年苏修从智利进口七百三十万卢布的货物中，铜占了百分之九十七点七。根据一九七二年签订的关于铜的贸易协定，在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五年内，智利要向苏出口十三万吨铜和八千七百万美元的铜制品①。

苏修官方供称，它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非铁金属矿石和

①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218页。

精选矿石，从一九六三年的七万五千吨，增加到一九七五年的九十万吨。这说明苏修对第三世界矿产资源的掠夺是在步步加强。为此，苏修炮制了一种强盗理论，胡说什么“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这些资源的利用能力”。这就是说，具有“利用能力”的超级大国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是合情合理的。这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本性的又一次大暴露。

二、贪得无厌地掠夺农副产品

（一）强要发展中国家用大量的农副产品偿还“贷款”。

农副产品是苏修对受“援”国掠夺比重最大的一类物资。据统计，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苏出口的货物，纤维原料与半成品占百分之二十六，食品占百分之三十一，这两项合计即占发展中国家对苏出口的百分之五十七^①。苏修报刊供认，仅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三年期间，苏修用迫使第三世界国家还债和不等价交换的方式，攫取的橡胶达一百零七万吨，棉花九十万吨，以及大量的食品^②。

埃及主要是用世界闻名的长纤维棉花和棉纱来偿还苏修的债务。苏修每年从埃及攫取的棉花达埃及棉花产量的百分之四十左右^③。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的棉花季节，埃及的棉花总产量为五十八万四千六百八十一包，苏修就拿走了

① [日]《调查月报》1973年5月号。

② [苏]《对外贸易》杂志1974年第9期。

③ [法]《震旦报》1973年12月25日。

二十万零八千一百四十三包，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六左右。除了棉花以外，埃及为了对苏还债和出口，还要提供大量的大米、柑桔和蔬菜等农产品。埃及报刊揭露，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三年，苏修用低价从埃及掠走的物资，达十亿六千多万埃镑，其中主要有：棉花、棉纺织品、水果、蔬菜、大米、酒、纸烟等^①。为此，使得埃及国内的柑桔、土豆、洋葱等果菜供应极为紧张，一度引起成倍的涨价，给埃及人民生活带来了困难。

在苏修要求印度用来偿还债款的出口物资中，有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是所谓“传统商品”，例如黄麻、黄麻制品、茶叶、皮革、烟草、核桃、咖啡和香料等。据苏修《对外贸易》杂志报道，苏联从印度进口黄麻、茶叶等十二种农副产品的进口额，占从印进口的原料总额百分之六十以上。另据印度《解放》杂志揭露，印度出口的生皮革的百分之七十五，香料的百分之三十七，羊毛的百分之五十七，油饼的百分之七十三，植物油的百分之四十七，咖啡的百分之五十八都是输出到苏联的。一九七三年印度的花生欠收，其产量是十五年来最低的一年，市场上花生油十分缺乏，但苏修却压印度增加花生油的出口来抵债。《印度教徒报》愤懑地指出：“以出口货物偿还债务的方式加剧了国内有关货物的匮乏情况。”

苏修对伊拉克、叙利亚、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亚洲国家，也通过抵偿“贷款”的方式，大量攫取棉花、羊毛、黄麻、大米、皮革等重要农副产品。苏修从伊拉克

① [埃]《金字塔经济》1975年4月1日。

进口棉花的数量，自一九七一年后成倍增长；从叙利亚进口棉花的价值，占苏从叙利亚进口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从伊朗所得的棉花，在伊朗棉花出口总额中占越来越大的比重，近年来已占四分之一以上；据阿富汗《东方报》报道，阿富汗向苏出口棉花的数量，一九七二年已达七千吨。苏修从这些国家掠夺的羊毛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伊朗出口的羊毛，几年来几乎全部被苏修所霸占；阿富汗向苏输出的羊毛，占阿羊毛出口量的百分之九十；叙利亚把羊毛作为仅次于棉花的第二位对苏输出品。

苏修从北非国家掠夺农副产品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阿尔及利亚的苏“援”酒厂生产出来的白兰地酒，要全部卖给苏修。近年来苏修从阿尔及利亚掠得的葡萄酒，占阿向苏出口额的四分之三，而苏修尚嫌太少。摩洛哥运交苏联的橙和突尼斯运往苏联的橄榄油，也都占这两国向苏出口额的四分之三以上。

苏修向第三世界掠夺农副产品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近几年来，苏修打着“援助”的旗号，把它的强盗之手伸向拉丁美洲国家。拉美各国的糖、可可、咖啡、棉花、羊毛、水果、植物油等等，都已成为苏修“感兴趣”的东西。

（二）大量掠夺“经互会”一些国家的农牧产品。

在苏修的驱使下，保加利亚一直保持着落后的农业国的状况。它所生产的蔬菜、水果、食品罐头，大量运往苏联。一九五〇年保加利亚蔬菜和水果对苏出口总额仅为一千二百万列弗，到一九六八年已增至二亿六千万列弗，等于一九五〇年的二十一点七倍。

匈牙利的水果、蔬菜、罐头、饮料和屠宰禽类，在本国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也被迫运交苏修。一九七一年，匈牙利的蔬菜和水果大幅度减产，但仍需大量供应苏修，于是造成国内水果和蔬菜的价格暴涨。据匈牙利官方公布的材料，水果和蔬菜在一九七一年上涨了百分之十二到十五。匈全国物资和价格局长被迫承认，因蔬菜和水果涨价，“给低薪劳动者、多子女家庭和退休者带来了困难”^①。

苏“援”不仅没有使古巴摆脱殖民地的“单一经济”，相反，却变本加厉，成了苏修的甘蔗园。苏修《经济报》承认，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二年，苏修从古巴掠夺了二千五百万吨原糖。近几年来，苏修进口的糖百分之百都是来自古巴。苏修变古巴为自己的甘蔗园的图谋，已给古巴的经济带来了悲惨的后果，但苏修出于自己的私利，仍把“援助”重点放在古巴的糖业生产上。例如，一九七三年一月三日，卡斯特罗宣布同苏修签订的五笔“贷款”，主要是用在糖和镍的生产上，其中包括“援”建一座年产六百台的甘蔗联合收割机工厂，以及部分糖厂的修建和设备更新。与此同时，苏修还要“经互会”其他成员国，对古巴糖业生产有关的互助部门分担“援助”额，以便驱使古巴为它生产更多的糖^②。

为了供应苏修大量柑桔，古巴正在发展柑桔生产。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在题为《对古巴经济发展的分析及其前景》的讲话中说：“柑桔种植规划已经开始，目的……主要是供应

① [匈]《人民自由报》1971年12月22日。

② 新华社哈瓦那1974年4月8日航讯。

国外市场，而特别优先的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这样，古巴不仅是苏修的甘蔗园，而且将被迫成为果树农场了。

长期以来，苏修从蒙古掠夺去大量的畜产品。据透露，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蒙苏长期贸易协定规定，蒙古每年要向苏联供应肉畜七万吨，约等于蒙古全年征购牲畜的一半。如按蒙古官方公布的每只活羊的征购体重平均为二十九公斤半计算，苏修每年从蒙古掠走二百三十七万头羊。此外，蒙古每年还要向苏联出口食用马六、七万匹。蒙古还必须向苏联驻军、各类“专家”及其家属供应肉食，其总量约等于蒙古国内市场供应量的四分之一。由于大量的牲畜被苏修掠去，蒙古仅有的几个肉类加工厂、毛纺织厂、地毯厂、皮鞋厂和皮革厂，常因原料供应不足，而停工待料。有的工厂的开工率，只达三分之一左右^①。

三、加紧搜刮工业消费品

随着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加快，消费品的严重匮乏，已成为苏修长期无法克服的困难。在苏修二十五大的总结报告中，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哀叹：“乙类部门的状况，不能使我们满意。”为了缓和劳动人民的不满，苏修日益加紧向受“援”国搜刮消费品。在苏修的进口商品构成中，工业消费品的比重不断增长。一九五五年，工业消费品的进口占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四点八；一九六五年上升到百分之十四点二^②；一九七

① 新华社1974年11月26日讯。

② [美]《苏联对外援助净成本》。

二年则达到了百分之十八点六^①，发展趋势还将继续增长。

(一) 强迫东欧各国增加工业消费品的供应。

为了扩大消费品的进口，苏修首先强迫东欧一些国家向它增加供应。近年来，匈牙利向苏联出口的工业消费品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匈苏贸易平均增长速度。据苏修《对外贸易》杂志一九七一年第六期资料，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的苏匈贸易协定，规定两国贸易比上一个五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三到五十四；而同时期，匈向苏出口的主要消费品，如缝纫品和皮鞋，将分别增加一倍和两倍。现在，匈牙利每年要向苏联供应八百万双皮鞋，四千多米各种布匹，和占匈牙利全部产量一半以上的药品^②。

据波兰外贸部长透露，近年来，波兰向苏修供应工业消费品的增长速度是最高的。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两国贸易协定规定的换货额增长百分之六十七，而同一时期波兰向苏修供应工业消费品则要增加一倍。波兰被迫“满足”苏修对毛织品进口需求的百分之五十，棉织品的百分之二十，缝纫品、皮鞋和家具的百分之十五，药品和化妆品的百分之二十五^③。

捷克斯洛伐克是在无法满足本国对消费品需要的情况下，被迫增加向苏修出口消费品的。捷外贸部长抱怨说：“尽管捷克斯洛伐克生产消费品的工业的潜力受到生产能力、

① [日]《苏联东欧贸易调查月报》1974年第2期。

② [苏]《苏联贸易报》1973年3月27日。

③ [苏]《对外贸易》杂志1971年第9期。

物力和人力的限制，还是拔出最大数量的产品提供给苏联。五年内（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应该向苏联提供的消费品的数额超过了十三亿卢布。”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被迫向苏修供应消费品的数量，在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期间，达到二十三亿卢布，主要是缝纫品、针织品、家具和地毯等。

（二）向发展中国家勒索廉价消费品。

除了东欧各国以外，苏修还向接受苏“援”的发展中国家勒索大量廉价消费品。

印度向苏修出口的皮鞋、棉布、针织品、成衣、卷烟、刀叉、木器等消费品都在不断增加。苏修报刊供认，苏联工业消费品的“主要提供者是印度”，仅一九七三年，苏修从印度获得的工业消费品为一亿四千六百多万卢布②。为制造这些消费品，印度常常被迫用十分缺乏的外汇，向国外进口棉花和其他原料，制成成品以满足苏修的需要。

为了偿还苏修的阎王债，一些中东国家都被迫向苏修供应大量消费品。在埃及对苏出口的成品和半成品中，主要是服装、皮鞋、肥皂、化妆品、木器家具和地毯等消费品。叙利亚出口的服装和皮鞋，有一半左右被运往苏联。伊朗出口的洗涤剂、皮鞋、针织品和服装，近年来几乎绝大部分或甚至全部是输往苏联的。土耳其的纺织品、鞋袜等，也作为“传统商品”运往苏联。苏修对伊拉克的“援建”项目，有许多是轻

① [苏]《对外贸易》杂志1971年第8期。

② [苏]《对外贸易》杂志1975年第9期。

纺工业，其目的是为了从伊拉克取得大量的廉价消费品。

大量事实说明，从地下资源、农副产品到工业消费品，苏修几乎是无所不要。他们美其名曰对一些国家进行“援助”和“支持”，而实际上是采取种种手段向受“援”国进行殖民主义的掠夺。苏修《对外贸易》月刊直言不讳地说：

“苏联购买了它们的传统出口商品和它们的幼稚的国民工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通过增加从这些国家输入产品，以及通过它们用产品来偿付苏联所提供的信贷，这使苏联可以获得多种原料的丰富供应和使苏联国民享有丰富的食品和消费品。”苏修的另一份刊物《国际事务》也供认：“苏联对外贸易部利用第三世界所偿还的贷款和利息去购买原料。它们购买印度的茶、羊毛、麻、咖啡和烟草，以及购买金属制品和各种消费品；购买埃及的传统出口商品棉花、棉纱和大米等，以及购买用苏联援助兴建的企业所生产的金属产品、汽车及拖拉机零件和其他产品。”它们从反面告诉人们，苏修的什么“援助”啊，“支持”啊，不过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掠夺受“援”国的一张画皮。它们所说的“购买传统商品”，不过是老牌帝国主义者长期向殖民地搜刮重要商品的故伎。它们要受“援”国保持这个“传统”，无非是要受“援”国永远保持落后状态，成为苏修的原料产地和消费品供应地，以便于苏修进行残酷的殖民剥削。

四、到处窃取经济情报，拼命争夺新的原料来源

苏修并不满足于今天所能掠夺到的大量东西，还有预谋地通过所谓“技术援助”和“技术合作”，派出大量所谓

“技术人员”和“专家”，极力渗入到受“援”国的资源勘察和勘探活动中去，大量窃取这些国家的地质、矿藏、水文等资料和情报，为争夺新的原料来源，更大规模地攫取各种资源作准备。

苏修通过与一些中东国家签订“共同开发”协定，到处勘探石油资源和其他矿藏资源，窃取了这些国家大量资源情报。例如，在埃及，苏修以“援助”为幌子，对埃及的全国地下矿藏资源进行了“全面勘察”。在印度，苏修控制了孟买沿海的石油勘探权。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苏修通过所谓“援助”，派出了大量“顾问”、“专家”、“技术人员”，借“勘察”之名，走遍这两个国家，刺探了两国的矿藏资源等大量经济情报。据报道，在勘察中，苏修在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地区曾发现铀矿藏，但苏修拒绝向阿方提供这方面的任何资料。四年之久的普查，阿方竟一无所得。

在马里，苏修对基达尔和凯斯地区的铀矿藏进行了广泛的“勘探”。在伊朗，苏修不仅在霍腊散地区，而且还在沿伊朗的里海区域进行着“联合勘察”。

在古巴，苏修通过所谓苏古“两国在渔业方面进行全面合作”，全面探察了古巴周围（包括加勒比海，墨西哥湾和古巴附近的大西洋海域）的海洋资源情况。这种“探察”活动，同样也在非洲的索马里沿海进行着。苏修利用索马里海岸线长达三千公里、鱼类资源十分丰富的特点，于一九七一年同索马里就“发展”渔业及其他经济达成了一项协议，并派出了一批“专家”到索马里的印度洋沿岸进行“调查”，为它在印度洋扩大势力范围和掠夺索马里的渔业资源作准备。

列宁指出：“对于金融资本来说，不仅已经发现的原料来源，而且可能发现的原料来源，都是有意义的”。 “金融资本也估计到可能获得的原料来源，惟恐在争夺世界上尚未分割的最后几块土地或重新分割已经分割了的一些土地的疯狂斗争中落后于他人”。（《列宁选集》第2卷第803、804页）苏修这样热衷于到处进行所谓“勘察”和“勘探”活动，就是为了在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中，争夺更多的新的原料来源。

第二节 推销陈旧劣质商品

伟大导师列宁指出：“金融资本造成了垄断组织的时代。而垄断组织则到处实行垄断的原则：利用‘联系’来订立有利的契约，以代替开放的市场上的竞争。最普通的现象，就是规定拿一部分贷款来购买债权国的产品，尤其是军用品、轮船等等，作为贷款的条件。……资本输出成了鼓励商品输出的手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86页）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走的正是老牌帝国主义的老路，到处奉行列宁早已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垄断“原则”，甚至比老牌帝国主义做得更狡猾、更凶恶。它以“援助”的形式，大量输出资本，并且规定受“援”国不仅是“拿一部分贷款”，而是要拿全部“贷款”去购买苏联商品。这样，“援助”就成了苏修大量推销傻大粗笨的劣质商品，获取大量利润和外汇的重要手段。苏修对外经委主席斯卡切科夫在一篇文章中毫不隐讳地写道：“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援助促进了苏联外贸的增长和设备出口的扩大。……依靠这些，对于满足苏联国民经济的

需要就增加了更大的可能性。”①

苏修对受“援”国输出的机器设备，其质量之低劣是十分惊人的。例如：由苏修“援”建的印度比莱钢厂，不仅施工缓慢，而且成本高、质量差、开工率低。该厂从一九五六年四月动工建造，到一九七〇年三月，实际年产能力还不到原设计能力的百分之六十七。苏修为这个厂提供的柴油发动机，其保养费用要比标准柴油发动机多出五倍②。这个厂的耐火材料也由苏修供应，质量很差，造成该厂每生产一吨钢所需要的耐火材料要比苏联钢铁厂使用的多两倍至四倍。这家钢厂从一九五九年以來，年年亏损，其中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〇年度的亏损达到三亿九千九百万卢比③。

由于苏修提供的机器设备质量低劣，加上管理很糟，印度的其他一些苏“援”企业也连年出现巨额的亏损。如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由苏修“援”建的一家矿山机械公司，苏修扬言每年可生产设备四万五千吨。但到一九七一年，这家公司 的产量还只有二百四十五吨，而且因为产品质量达不到标准，经常被用户退货；它的生产成本也超过售价。另一个苏“援”印度制药公司也是年年亏损。一九七二年，该公司的实际投资为二亿五千五百万卢比，而亏损累计已达三亿四千五百万卢比。这个公司所属的一个医疗器械厂所生产的医疗器械，由于陈旧笨重，“达不到最起码的标准”，“谁也不

① [苏]《真理报》1973年3月9日。

② 香港《大公报》1973年11月3日。

③ [印]《印度年鉴》1971—1972年第350页。

准备使用”。所以，这个厂现在只好生产刀剪了。印度制药公司所属的抗生素厂，“几年来，只能生产甚至连牲口都不适用的青霉素。”这些情况给印度造成很大损失，印度舆论愤怒地问道：“把我们的财富去换取过时无用的三等机器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呢？”①

印度政府在国会发表的声明承认：苏修在印度“援”建的十三个重大项目，有十个是亏本的②。

据印度《思潮》周刊报道，苏修在查漠钻探石油，是于一九五七年制图，一九六四年勘探，一九七〇年三月开钻；原计划钻六千公尺，投资二千万卢比，但到一九七三年四月，仅钻了三千公尺，耗资四千万卢比，最后由于地下瓦斯和热水喷出，工程报废，使印度不得不重新与西方国家另订合同。

苏修通过“援助”卖给印度的石油钻机，由于质量低劣，在印度闹了笑话。一九七〇年三月三十一日，在苏修“从勘测、立架到开钻各方面给予全面的帮助”下，印度的第一口沿海油井在阿利亚贝特开钻。当时，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兴致勃勃地到场剪彩和按电钮。结果，“在开钻二十分钟以后，机器就坏了”。印度《民族前进》周刊对此十分不满地说，“我们让俄国专家愚弄了一场”③。

苏修卖给古巴五百台联合收割机，使用的结果是“令人

① [印]《民族前进》周刊1974年4月27日。

② 新加坡《星洲日报》1972年1月11日。

③ [印]《民族前进》周刊1973年3月10日。

失望”的，因为这些机器只能在“土地绝对平坦”以及“在白天和良好的气候下工作”^①。

一九七三年四月，智利政府要求退还苏联一百二十五台拖拉机。智利报纸透露，这是因为“这些拖拉机不能工作”。

苏修卖给别人的机器设备，不仅质量低劣，技术落后，而更为卑劣的是，竟把一些旧机器旧物资油漆刷新一下，便当作“新”机器“新”物资卖给人家。例如，苏修卖给埃塞俄比亚的“新”机器，原来是六十多年前的破旧玩艺。它对蒙古也是这样干的，把旧轮胎修补一下，当作“新”轮胎卖给蒙古。

为了把傻大粗笨的机器设备强行向受“援”国推销，苏修采取了许多卑劣的手段。

第一、把受“援”国购买苏修的劣质机器设备和呆滞物资，作为提供“援助”的先决条件。

由于苏联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国内积压了大量落后的机器设备。苏修只从自己的私利出发，不考虑别国的实际需要，不顾别国的利益，在提供“援助”时，规定受“援”国必须购买苏修的机器设备。苏修对各国的“援助”出口，机器和设备占绝大部分。据美国政府出版局出版的《苏联经济的新方向》一书的材料，苏修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援”的百分之八十是机器设备，而主要又是成套设备^②。以非洲为例，苏修通过

① [英]《每日电讯报》1965年6月11日。

② [美]《苏联对外援助净成本》。

所谓对外“援助”，向非洲推销的劣质机器设备，一九七四年同一九六〇年相比，增加了九倍以上。不仅如此，苏修还把许多不适用或不需要的东西“援助”给别国。例如：苏修以“维修零件”的名义，向印度兰契重型机器厂倾销了足以使用五年的耐火材料；印度的比莱钢厂也因为苏修的强行推销，积压了一千五百七十万卢比的苏制零件。苏修未经蒙古同意就将一批电冰箱运到蒙古，由于这些电冰箱卖不出去，使蒙古积压了大量资金。苏修向地处热带的加纳强行推销雪橇的事情，已成为举世皆知的丑闻。

相反，对受“援”国迫切需要的某些重要原料，苏修则故意刁难，借机勒索，甚至完全拒绝。例如，印度曾多次要求苏修提供锌、镍、铜、铅等金属原料，长期遭到拒绝；后来发生了印度肢解巴基斯坦的战争，苏修为了使印度听命于它，才给了很少一部分。印巴战争过去后，又恢复到了过去的样子。一九七三年，印度贸易和经济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希望苏修能供应某些原料，而苏修表示只愿提供那些不受人欢迎的机器设备。印度代表团一无所得，结果空手而归^①。苏修为了从经济上压垮埃及，常常无理地停止向埃及供应机器零件和原料，为此，在一九七五年，埃及约有四分之一的工厂陷于停工状态。

第二、打着“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等幌子，强迫受“援”国购买自己的劣质产品。

一九七二年，苏联的机器设备出口总额为三十亿零五

^① 香港《经济导报》1973年第34期。

百七十万卢布。其中在“国际分工”的幌子下向“经互会”各国就出口了十九亿六千九百九十万卢布，占总额的三分之二^①。这给“经互会”一些国家带来了严重恶果，激起了他们的不满，纷纷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买卖。苏修对此甚为恼火，百般加以威胁。苏修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参赞谢苗诺夫在捷发表了一通讲话，指责捷克的“一些工厂和企业”，“经常从西方购买一些产品”，“只在资本主义国家寻求进口机器和设备的可能性”。这位参赞先生利用东欧一些国家的大部分燃料和工业原料必须依赖苏修供应的弱点，公然威胁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伙伴们能够理解，如果他们的国内市场不向苏联的机器设备开放。那么，苏联就没有进一步发展经济关系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供应燃料和原料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在这篇讲话中，他公然不许捷克斯洛伐克发展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说什么“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器制造业是投资过多的部门，今后必须使机器制造业的基本建设的规模达到最低程度”。请看，苏修为了推销自己傻大粗笨的机器设备，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第三、乘人之急，敲诈勒索，强销硬卖。

据《印度时报》报道，一九七四年初在新德里举行的印苏谈判中，印度要求苏修供应若干重要部件，以便使印度的重型电机厂能够自己制造若干设备，还要求提供若干原料，以便生产其他重要电机部件。这家报纸说，这些部件和原料，是印度为制造发电设备和生产部件以发展本国生产能力所急需的。

① 香港《经济导报》1973年第41期。

而苏修竟然趁机施加压力，逼迫印度购买两台成套涡轮机，作为它向印度提供这些部件和原料的条件。同时，苏修还企图迫使印度购买用于二百万瓩大型火力发电站的设备^①。结果，印度购买了两套二十万瓩的发电机（虽然印度国内已开始生产这种发电机），才换得苏修十三亿卢比的原材料和部件。

第四、设下圈套，迫使受“援”国上钩。

阿富汗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苏修在“帮助”阿富汗使用自己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的幌子下，“援助”阿富汗建设了一个用天然气作原料的化肥厂。但是这个化肥厂只能用无硫天然气，而阿富汗自己并没有脱硫的天然气提炼厂，如果不建脱硫的天然气提炼厂，就只好长期靠苏修供应脱硫天然气了。于是阿富汗只好再次求苏修给予“援助”。苏修就是使用这种卑劣手段来推销自己的劣质机器设备的。

恩格斯指出：“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66页）苏修就是利用上述种种卑鄙手段来达到其卑鄙目的。它通过“援助”，把大量傻大粗笨的机器设备推销给受“援”国，这既能赚取大量利润，又可以获得其日益缺乏的外汇。

多年来，苏修为了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和改变其生产技术落后状态，热衷于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搞“长期”的、“广泛”的、“大规模”的“经济合作”。它向西方国家买粮“食、买机器、买设备、借贷款。苏修头目们还周游西方各国，到处磕头朝拜。据不完全统计，到一九七六年初，苏修已

① 《人民日报》1974年1月24日。

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乞讨了二百多亿美元的贷款，其中一九七五年就借了一百三十多亿美元。此外，苏修同西方国家的贸易逆差也越来越大，一九七二年达到十二亿美元，一九七五年更猛升到四十八亿美元。因此，苏修的外汇越来越匮乏，大有捉襟见肘之势。

苏修为了偿付西方的贷款和贸易逆差，加紧向受“援”国推销陈旧劣质产品，造成对受“援”国贸易顺差，以夺得大量外汇来源。据联合国的统计，苏修对发展中国家和“经互会”国家的贸易顺差，一九六五年为二亿五千三百万美元，一九七四年增加到二十三亿七千七百万美元。从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四年，苏修对第三世界国家和“经互会”国家的贸易顺差共七十三亿三千九百万美元。（见表3）

表3 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外贸差额情况

（单位：百万美元）

国家类别	项目	1960年	1965年	1970年	1971年	1972年	1973年	1974年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包括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	进口	1,104	1,632	2,822	2,888	4,146	6,225	8,104
	出口	1,012	1,494	2,390	2,754	2,942	4,937	8,241
	逆差	92	138	431	134	1,201	1,287	~ 137
“经互会”国家 和第三世界国家	进口	4,524	6,427	8,909	9,592	11,901	14,882	16,762
	出口	4,551	6,680	10,410	11,052	12,419	16,366	19,139
	顺差	27	253	1,501	1,460	518	1,483	2,377

* 顺差

资料来源：根据1973年6月和1975年7月联合国《统计月报》折算。

苏修对受“援”国的大量贸易顺差，一部分可以立即取得外汇；一部分则以“援助”形式放高利贷，在受“援”国偿还贷款时，获取更多的外汇。对此，苏修《政治自修》杂志洋洋得意地说：“得自发展中国家偿还贷款的外汇收入逐年增多，这对苏联国际收支平衡是一个重大贡献。”这里，人们可以看到，苏修“援助”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把受“援”国变成苏联商品的倾销市场和获取外汇的源泉。苏修《真理报》恬不知耻地鼓吹什么：发展中国家“同苏联”“实行经济合作是特别重要的”^①，但事实却告诉人们，“特别重要的”倒是通过这种“经济合作”，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大量吮吸了受“援”国的膏血。

第三节 贵卖贱买，攫取超额利润

苏修到处吹嘘他们提供的是“低利贷款”，对发展中国家是十分“有利”的。果真是这样的吗？完全不是。它的利率本来就不低，而且还通过高价卖、低价买等种种手段，对受“援”国进行着十分残酷的剥削。所以，苏修的“贷款”，实际上是十足的高利贷。

一、通过“援助”，扩大贸易， 为攫取超额利润打开通路

列宁曾经分析过帝国主义的两种贸易输出：“第一种是对财政上依赖于帝国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国家借钱的国家

① [苏]《真理报》1974年4月3日。

的输出；第二种是对财政上独立的国家的输出”。他得出结论说：“对财政上不独立的国家的输出，毕竟要比对财政上独立的国家的输出增加得快些”。（《列宁选集》第2卷第833页）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外贸易，完全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无比正确。

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四年期间，苏修与其重点“援助”对象的“经互会”国家之间的贸易，每年都大约占了苏修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受“援”国之间的贸易，其增长速度，除个别国家因特殊原因外，都大大快于平均贸易增长速度，其中有的国家竟快于平均增长速度十倍以上。（见表4）

苏修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有了迅速增长。苏修通过所谓对外“援助”，与受“援”国订立“双边贸易协定”或“经济合作协定”，大大扩大了对这些国家的贸易。据《苏联对外援助净成本》一书的计算，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八年，苏修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对受“援”国的贸易平均每年以高达百分之二十一点九的速度增长。其中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二年苏“援”大肆开展阶段，更以平均每年百分之三十一点八的惊人速度迅速扩大；而在同一期间，与发展中国家的非受“援”国的贸易发展速度，平均每年只增长百分之十。到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八年期间，苏修与受“援”国的贸易发展速度，虽然下降到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九点八；但同一时期与非受“援”国之间的贸易增长速度，只为平均每年百分之六。前者仍比后者高百分之六十多。由于“援助”带来了对受“援”国贸易的额外扩大，

使苏修对外贸易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八年期间额外增加了三十八亿八千五百万美元。发展中国家的受“援”国在苏联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从一九五五年的百分之一点一，变成了一九六八年的百分之五点七。一九七二年，达到了百分之八点七，到一九七四年，更达到近百分之十一。而且，将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

对外贸易的扩大，为苏修进行贵卖贱买，向受“援”国攫取超额利润打开了通路。列宁曾经指出：“事实清楚地说明：输出的增加，恰好是同金融资本的骗人勾当相联系的，金融资本并不关心什么资产阶级的说教，它要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第一张皮是从贷款取得的利润，第二张皮是在同一笔贷款用来购买克虏伯的产品或钢业辛迪加的铁路材料等等时取得的利润。”（《列宁选集》第2卷第834—835页）无比贪婪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甚至想从一条牛身上剥下更多的皮来了。

二、贵卖贱买，牟取暴利

苏修对受“援”国的贵卖贱买，含有双重的剥削内容。

其一，苏修对大多数受“援”国，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主要是输出机器设备等工业制成品；受“援”国则用农矿原料来偿还贷款和利息。长期以来，由于帝国主义不合理地抬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矿原料的价格，在工业制成品与原料（或初级产品）之间存在着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而有利于工业发达国家的价格剪刀差，而且这种剪刀差还在不断扩大。据联合国有关统计资料，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

主要出口产品——初级产品（包括食品、原料、矿产品、燃料）的价格，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〇年的二十一年间，一直低于一九五〇年的水平，而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价格却不断上涨，一九七〇年比一九五〇年上涨了百分之四十四。随着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不断扩大，使发展中国家遭受不等价交换的剥削日益严重。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二年间，损失竟达一千零三十四亿九千四百万美元。这个庞大的数字，比一九七二年亚非拉全部出口总值还多三百五十八亿九千四百万美元。这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下降。（见表5、6、7）

在这方面，人们可以看到大量触目惊心的事例。如：加纳的可可，一九五四年产量是二十一万吨，收入为八千五百五十万英镑；十年后，产量增加到五十九万吨，收入却下降到约七千七百万英镑。而在同一个十年期间，在加纳，一辆载重五吨的卡车的售价提高了近十倍。二十年前，非洲国家用八包或十包棉花就可以换回一台拖拉机，而今天买一台拖拉机则需要出口二十五包棉花。一九五五年，一吨天然橡胶可换回六点三九吨的新闻纸，一九七二年则仅能换回二点一三吨了。对此，阿尔及利亚布迈丁主席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

表5 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价格指数比较

年份	1950年	1960年	1970年	1971年	1972年
初级产品	100	91	96	102	112
工业制成品	100	122	144	153	165

表6

发展中国家由于贸易条件恶化而蒙受损失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1960—1963	1964—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60—1972累计总额
损失	224.18	277.87	91.18	96.89	111.47	119.16	114.19	1,034.94
每年平均损失	56.05	69.47						79.61

表7

亚非拉国家在国际贸易上的比重
(百分比)

年份	出口			进口			工业发达国家	工业发达国家
	亚非拉国家	工业发达国家	亚非拉国家	工业发达国家	亚非拉国家	工业发达国家		
1955	25.3		64.7		24.7		60.0	
1960	21.3		67.0		22.3		65.8	
1965	19.5		65.8		19.2		69.3	
1970	17.6		71.7		17.2		72.2	
1972	16.3		72.6		17.6		72.1	

注: 5、6、7三表均引自《人民日报》1974年4月22日。

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发达国家控制了主要的原料消费市场，而且几乎垄断了制成品和设备的生产，同时它们还垄断了资本和服务事业，因此它们能够任意确定它们从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原料以及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设备和劳务的价格。”

“这样，它们便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为自己榨取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

苏联是大量出口包括机器设备、汽车、拖拉机和纸张等工业制成品的国家，也是大量进口包括可可、棉花、天然橡胶等初级产品的国家。这些商品，即使完全按照国际市场价格进行贸易，苏修也从帝国主义的不等价剥削中，分得一大笔赃款。

其二，苏修利用其债权国的地位，超过世界市场价格卖出和低于世界市场价格买进，对受“援”国进行残酷的剥削，攫取超额利润。

苏修对受“援”国贵卖贱买，是它的惯用伎俩。各方面的材料证明，苏修向亚非拉国家的出口价格，一般要比国际市场价格高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有的甚至高出两倍。相反，苏修从这些国家进口物资，则压价贱买，其价格要比国际市场低百分之十、二十、三十不等。

据美国《苏联对外援助净成本》一书的材料，发展中国家购买苏修商品的价格，要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苏修购买同样商品的价格平均至少高百分之十五，而且可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五。其中机器设备和工业品的差价更大。如把苏修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有出口的几种商品作比较，一九五八年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价格，平均要比向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出口的价格高百分之三十二点六；而一九六五年，则高百分之三十四点七。在苏联的进口方面，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八年，苏修根据双边贸易协定，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价格，比世界市场价格平均低百分之十到十五。上述的估算，还是最低限度的，实际上都大大超过这个比例。

如果按照上述比例来计算，则苏修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二年期间，约从发展中国家攫取了不少于四十五亿美元的超额利润，占苏修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二年对发展中国家“经援”总额八十一亿九千六百万美元的百分之五十五左右，相当于苏修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二年向发展中国家实际收取的贷款利息的十倍。可见，苏修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是十分残酷的。它所提供的“贷款”绝不是什么“低利贷款”，而是彻头彻尾的高利贷。

从下面的事实可以进一步看到，通过贵卖贱买，苏修对受“援”国的剥削，简直是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间，苏修卖给印度的石油和石油制品的价格，比向西德出售同类商品的价格平均高出百分之三十；一九六九年苏修向印度出售一万五千台拖拉机，其备用零件的价格要比它卖给东欧国家的高两倍；同年，苏修卖给印度的镍每吨三万卢比，而在欧洲市场上，当时仅为一万五千卢比。苏修从印度购进的商品，其价格则比国际市场价格低得多。如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度，印度向苏联输出黄麻一万五千九百吨，每千吨为二十六万二千卢比，比印度平均出口价格低百分之三十一；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度出口到苏联的黄麻，则比印度平均出口价格低百分之十七

点二：同年向苏出口的黄麻制品为十多万吨，每吨价格为一千六百六十七卢比，面向英国的出口价格则是每吨三千二百零六卢比。

《印度斯坦旗报》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一则报道指出：“苏联是一个极力讨价还价的买主，同印度做生意实际上等于榨取印度工人的血汗。俄国作为一个大买主是能够施加压力和杀价的。”这则报道还说：“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度，俄国人以每公斤七十五卢比的价格购买毛针织品。国际市场的原毛价格已经上涨了四倍，但是现在苏联甚至还不愿意每公斤付八十五卢比。”印度《斗争》周刊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一期的社论中，驳斥了所谓苏修给印度的信贷利息比资本主义国家低的说法。社论说：“如果深入地看一下，人们就会发现苏联的剥削更加残酷。从苏联来的进口货的质量比世界市场上的差，而且价钱比世界市场上贵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而印度对苏联的出口货却比世界市场上的价格要低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因此，在勃列日涅夫访印期间签订的经济协定将加紧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印度经济的控制，而且将进一步加强苏联对印度人民的掠夺。”旅英印度工人协会印发的一本小册子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给予印度的‘贷款’和‘援助’只不过是投资和高利贷的另一种形式”，“印度从苏联每得到一百卢比的‘援助’和‘贷款’时，就不得不在当年偿还一百六十卢比。”印度报刊的这些报道和评论，有力地揭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印度的剥削和掠夺。

据苏修《对外贸易》杂志的材料，苏修向埃及出口的某些商品的价格，要比向西德出口同类商品的价格高百分之十三

到一倍多。例如（每吨以卢布计算）：

	对埃及出口价格	对西德出口价格
石棉	140.62	108.86
生铁	68.56	41.38
亚硫酸纸浆	160.52	147.14
硫酸纤维素	160.00	115.85
煤	15.15	6.94

苏修以“援助”为名，不仅大量掠夺伊朗和阿富汗的天然气，而且还在价格上进行层层盘剥。长期以来，苏修以仅为国际价格的五分之一的低价购买伊朗和阿富汗的天然气。在一九七二年，苏修从伊朗和阿富汗进口了一百一十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只付了六千六百万卢布；同年，苏修出口了五十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却挣了六千八百万卢布。前者在数量上比后者多一倍多，而所得价款却不及后者^①。据伊朗《嘱托报》的统计，由于苏修低价购买伊朗的天然气，给伊朗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天达二十八万五千美元。

苏修对非洲国家也实行赤裸裸的贵卖贱买。一九六九年尼日利亚用两吨多可可豆换回苏修一辆载重汽车，只过了两年，到一九七一年竟需用六吨多才能换回一辆。一九七〇年苏修从阿尔及利亚进口四十九万七千二百吨葡萄酒，价格不及阿卖给法国的一半；而同年，苏修向阿尔及利亚出口的钢

① [芬兰]《十月》1974年第2期。

材，每吨价格却要比向法国出口的高百分之十，掘土机每台竟高一倍以上。

在拉丁美洲，古巴是苏修资本输出的重点，也是苏修进行高利贷剥削的主要对象。古巴所需要的石油，完全依赖于苏修。根据苏修官方统计数字，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〇年，苏修向古巴出口了五千一百五十三万吨石油和石油产品，价值五亿九千六百万卢布，平均价格为每吨十一点五四卢布；而同期卖给日本三千三百零七万吨石油和石油产品，价值三亿二千万卢布，平均价格为每吨九点七六卢布。两者相比，卖给古巴的平均价格比卖给日本的高出百分之十八点二八。这样，从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〇年，苏修就在苏古的石油贸易中，向古巴榨取了超额利润八千八百七十七万卢布。

在古巴革命以后，苏联已成为古巴蔗糖的主要出口国。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苏修在从古巴进口食糖的贸易中，已赚取了可观的超额利润。据英国《每日快报》一九六三年六月一日报道，在一九六三年头五个月内，苏修就在与古巴的食糖贸易中赚了一千九百万英镑。当时国际市场糖价迅速上涨到五十九英镑一吨，而苏修却以固定的价格三十二英镑一吨付款。除了价格上的差额以外，苏修还以自己的高价商品支付糖款，从而实际上抵销了大部分糖价。据法国《快报》报道，一九六〇年苏古贸易协定规定，苏修支付古巴糖款，还给百分之二十的外汇；到一九六五年，连百分之二十的外汇也不给了，全部用苏修卖给古巴的商品价款来顶帐。在一九七三年签订的苏古五项经济协定中规定，在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〇年期间，古巴向苏联供应原糖的离岸价格每吨为二百卢布，

约等于每磅为十一美分。一九七四年以来，在国际市场上，食糖价格不断上涨，每磅达到二十五美分以上。但古巴仍然要按照这个固定价格向苏联供应原糖。至于苏联向古巴出口的商品，例如石油、机器设备、粮食等等，在五项经济协定中却不规定固定价格，苏修可以随意提价^①。

“经互会”国家是苏修“大家庭”的成员。但是，苏修这位“家长”，在对它的“兄弟国家”进行掠夺和剥削的时候，一点也不手软。它一方面竭力提高自己的出口价格，另一方面肆意压低进口价格，使这些国家蒙受难以置信的重大损失。

据西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于一九六三年八月发表的题为《由“歧视而产生的剪刀差”进一步扩大了》一文的材料，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一年期间，在苏修向“经互会”一些成员国出口的七十五种商品中，其价格高于同时期苏修向西方国家出口价格的就有六十二种。由于价格上的差异，“经互会”国家要向苏修额外多付五十六亿旧卢布（约合十四亿美元）。

六十年代后，这种差价进一步扩大。例如，捷克斯洛伐克一台机器只能向苏修换取一百四十吨铁砂，而卖给其他国家则能换回五百二十吨；一辆铁道车辆只能从苏修换回一千三百吨石油，而卖给其他国家则能换回三千四百吨^②。波兰供给苏修的煤炭每吨为十五卢布，比国际市场价格低二到四

① 新华社哈瓦那1974年6月6日电。

② 《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0日。

卢布；供给苏修的海船比国际市场价格低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供给苏修的火车车厢目前还沿用一九六一年的价格。据西德《情报》杂志一九六九年第二十四期报道，苏修从东欧进口机器设备的价格，要比世界市场价格低百分之十到五十。

苏修向“经互会”国家出口的商品价格却高得出奇。卖给这些国家的石油，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苏修卖给意大利的石油每桶价格为一点三一美元，卖给日本是一点二六美元，卖给西德是一点二七美元；而卖给东欧国家则为二点六一美元，其中卖给匈牙利的价格竟高达三点〇四美元^①。根据苏修官方统计数字，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七年期间，苏修向西德、意大利、瑞士、日本、法国和西班牙等六国，共出售了九千九百一十一万多吨原油，其价格总额为八亿五千二百九十九万卢布；在同一期间，苏修向捷克、波兰、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共出售了九千八百七十七万多吨原油，而其价格总额竟达十七亿零五百六十二万卢布。东欧四国买的原油比六个资本主义国家少，而所付价款却比六个资本主义国家要多一倍^②。

将苏修向东欧国家出口的石油、铁矿石、硬煤、生铁、皮棉五种燃料和原料的价格，与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价格比较适中的西德作对比，可以计算出苏修从东欧国家所榨取的额外利润。（见表8）从此表可以看到，仅五种燃料和原

① 《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0日。

② 《战后帝国主义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110页。

表 8

苏联在五种燃料和原料的出口中从东欧六国所榨取的额外利润
(单位: 百万卢布)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合计
石 油	78.9	95.4	113.4	133.8	145.3	124.6	119.0	130.5	161.9	100.5	6.6	1,203.8
铁 矿 石	90.8	108.8	159.1	151.7	133.1	118.7	116.4	119.8	138.8	133.3	79.8	1,350.3
硬 煤	60.2	81.3	73.8	78.1	69.2	60.8	57.9	44.5	62.3	62.8	76.5	727.4
硬 皮	26.6	36.3	38.7	44.3	43.7	61.4	56.3	25.6	27.3	25.3	25.5	391.0
生 铁	14.9	21.3	31.7	42.6	33.0	35.9	51.3	39.2	24.8	46.5	0.6	228.8
合 计	271.4	343.1	416.7	450.5	424.3	401.4	360.9	379.6	415.0	275.4	189.0	3,907.3

注: 本表引自《苏联社会主义对外扩张》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0页。该书根据〔苏〕《对外贸易》附刊《苏联对外贸易统计概览》(1967, 1968, 1969, 1970, 1971年)有关数字计算编制。

料，苏修在十一年内从东欧六个国家榨取了额外利润三十九亿多卢布（合四十三亿多美元）。一九七五年，苏修单方面违反协定，提前一年提高石油和石油制品的价格，一下子便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左右，仅此一项，“经互会”国家在一年中就被苏修搜刮去十六亿美元。如果把其他商品都计算在内，那就大得惊人了。例如，西德《明镜》周刊一九七〇年第二十三期透露，苏修通过贵卖贱买，每年要从“经互会”其他成员国榨取五十五亿美元的超额利润。这是多么惨重的剥削啊！

在“经互会”国家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苏修第一号的贸易国家，因而也是受苏修剥削最重的国家。一九六九年，在苏修出口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西德的三十七种可比商品中，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口价格高于对西德出口价格的就有二十八种，平均高出百分之三十七点八，其中不少商品竟高出几倍之多。在这些商品中，仅黑色金属延材一项，就使苏修获得了八千六百八十万卢布的额外利润；二十八种商品的额外利润总额达到二亿卢布。另一方面，东德的 DP1600 型车床卖给苏联只有一万五千卢布，卖给其他国家的价格是二万三千卢布； GFL400×300 铣床卖给苏修是六千卢布，而卖给其他国家是九千卢布^①。据东德一位工程师透露，苏修支付东德的船舶价格还低于造船成本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

前东德部长会议办公厅科长维尔纳·奥布斯特（此人已

① 《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0日。

于一九六九年八月逃亡西德)在西德发表了长篇文章^①，其中题为《伟大的朋友——大量掠夺财物》部分揭露：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〇年间，东德购买苏联石油，每吨价格为一百二十外汇马克，而当时世界市场价格仅为六十到八十五西德马克(东德外汇马克与西德马克的比率为1:1)，几乎相差一倍。文中还揭露，前东德计划委员会的头目阿佩尔，因东德同苏修进行贸易每年要蒙受约二十亿马克的巨大损失，深表不满。一九六五年，阿佩尔同苏修就价格问题进行了谈判，迟迟不能达成协议。结果，阿佩尔被逼开枪自杀。第二天，只好由政治局委员诺伊曼代他在苏德贸易协定上签了字。

以上事实，说明了苏修通过贵卖贱买，对受“援”国进行剥削和掠夺，达到了何等疯狂的地步。在这里，不妨再听听苏修叛徒的自我招供，也可使人们更加认清他们的豺狼本性。

苏修外贸部长帕托利切夫说：“我愿意十分明确地说，无论对亚洲国家，近东国家，还是任何其他国家，我们从来没有所谓‘赔本地’出售商品。”^②这位部长先生说得有些“过谦”了吧，其实，又何止没有“赔本”！苏修《在国外》杂志说，他们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对苏联是“十分有利”的。这倒是千真万确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从来都把它的对外“援助”，作为“十分有利”的买卖来经营的。

① 载西德《世界报》1971年4月24—25日。

② [苏]《劳动报》1967年3月20日。

三、投机倒把，大发横财

苏修叛徒集团不仅对受“援”国进行贵卖贱买的盘剥，而且还利用从受“援”国进口的廉价商品，大搞“转口贸易”，进行投机倒把，大发横财。

苏修向伊朗和阿富汗提供“开发”天然气的“援助”，规定两国要用天然气来还债，而苏修却用这些天然气大搞投机倒把。据揭露，苏修以每一千立方呎十八点六英国便士的价格进口天然气，却以四十便士的价格转卖给西欧国家^①。苏修还以相当于进口价格的四倍向西方倒卖中东国家的天然气，转手之间获得百分之三百的暴利^②。

苏修利用它所制造的中东“不战不和”的局势，在石油上进行投机，大发横财。一九六七年“六·五”战争后，苏修就打着“军援”和“经援”的幌子，先后同一些阿拉伯国家签订石油协定，大搞“军火换石油”和“机器换石油”的勾当，把从海湾地区买来的石油，以成倍的价格卖给西欧国家。中东“十月战争”后，它又利用阿拉伯产油国家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的机会，大量向西方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瑞士《纳沙特尔舆论报》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的一篇评论写道：“一九七三年（苏联）石油和天然气的这种出口达五千万吨，给苏联国库增添了近九亿美元。”美联社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从纽约发出的一条消息，也揭露了苏修对待阿拉伯石

① 《人民日报》1973年10月30日。

② 《人民日报》1974年4月24日。

油禁运采取的两面手法，即公开“支持”而暗中破坏的行径。消息写道：“就在苏联公开支持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的同时，俄国人却将他们自己的石油产品运到美国。”这家通讯社援引美国海关的统计资料，仅在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一日到三月十八日之间，苏联运往美国的汽油已经超过一千五百五十万加仑。

另据英国《每日快报》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报道，不久前，伊拉克为了偿付“十月战争”中欠下苏修的军火费用，同意削价卖给苏修价值六百万英镑的石油。可是没过多久，苏修把这宗石油转卖给西德，卖了一千八百万英镑，获利百分之二百。人们因此送给苏修一个头衔：“‘资本主义’俄国的石油大王”。在阿拉伯国家向一些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的时候，苏修的这种作为，实际上就是破坏阿拉伯人民的革命斗争。

此外，苏修还用受“授”国卖给它的农产品投机倒把，大赚不义之财。苏修每年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棉花，除了从埃及、苏丹等国家进口质量较高的长纤维棉花以外，它还通过“援助”这一联系，从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进口一部分棉花。苏修在从巴西等国进口棉花的同时，又向古巴出口棉花。它一方面极力压低进口价格，另一方面又抬高出口价格，在从巴西进口和向古巴出口之间的差价，最高达百分之五十点七三，最低也达百分之十四点九六。在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〇年的十年内，苏修就赚了一千九百余万卢布的超额利润。

（见表9）

苏修曾向印度保证，苏方购买印度的产品不转售给第三

表 9

1961—1970年苏联在棉花进出口中榨取的额外利润
(以从巴西进口和向古巴出口作比较)

年 份	从巴西进口单价 (卢布/吨)	向古巴出口单价 (卢布/吨)	单 价 (卢布/吨)	向古巴出口量 (吨)	向古巴出口量 (万吨)	额外利润	
						利 润	(万卢布)
1961	494.26	577.86	83.60	15,000	1.5	125.40	
1962	502.04	577.14	75.10	6,300	0.63	47.31	
1963	475.03	610.30	135.27	8,200	0.82	110.62	
1964	480.32	559.25	78.93	12,000	1.2	94.72	
1965	461.83	601.70	139.88	16,500	1.65	230.80	
1966	450.13	678.50	228.37	13,200	1.32	301.45	
1967	447.50	560.60	113.10	13,800	1.38	156.08	
1968	494.60	695.10	200.50	16,900	1.69	338.85	
1969	426.70	591.34	164.64	13,400	1.34	220.62	
1970	422.67	611.73	189.06	16,700	1.67	315.73	
合 计				132,000	13.2	1,941.88	

资料来源：〔苏〕《1918—1966年苏联对外贸易统计汇编》；

〔苏〕《对外贸易》附刊《苏联对外贸易统计概览》(1967—1970年)。

注：转引自《苏维社会主义的对外扩张》，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08页。

国。可是，苏修为了赚取外汇，利用它的债权国地位，用卢比大量购买印度的茶叶、咖啡、胡椒粉、油饼、云母、腰果等可以换取外汇的商品，转口到国际市场上倒卖，从中牟利。印度《祖国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倒卖（印度商品）的行为现在正在以更大的规模进行”，“其结果是，印度不仅丧失了宝贵的可兑换的外汇收入，而且面临着一个价格被打乱了的市场，失掉订合同的机会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①据西方报纸报道，印度的“企业家、政府领导人以及许多政界人士也都抨击俄国人……的叫作‘转手贸易’的作法。”^②

不仅如此，苏修还在货币的比价上大耍花招，借以讹诈受“援”国。一九七六年三月，苏修单方面把卢布同卢比的比价从八点八八卢布换一百卢比，提高到八点六六卢布换一百卢比，并要求印度按照新的比价来重新计算“贷款”的本息。据估计，这将给印度增加四十亿卢比的额外债务。印度报纸指出：“苏联的这个要求，使印度政府感到惊讶”，“目瞪口呆”^③。可见，苏修的卑鄙无耻，已达到何等地步！

苏修一面大干投机倒把的肮脏勾当，一面则大唱什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调。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勃列日涅夫到印度访问时，在那里厚颜无耻地大讲什么“反对人剥

① [印]《祖国报》1973年12月1日。

② [美]《华盛顿邮报》1973年3月22日。

③ [印]《金融快报》1976年3月17日。

削人”呀，苏联对外经济贸易是“平等、互利”的呀，等等。什么“反对人剥削人”！难道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使自己大发横财的行为，不是“人剥削人”吗？！所谓“平等、互利”等等，难道不都是骗人的鬼话吗？！苏修叛徒们对外剥削和掠夺的无耻行径，充分暴露了他们贪财如命的丑恶灵魂。

四、“专家”横行，受“援”国负担奇重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列宁选集》第2卷第817页）苏修叛徒集团打着“援助”的旗号，向受“援”国派出大批所谓“专家”。这些“专家”在受“援”国横行霸道，控制经济，窃取情报，操纵这些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同时，还强迫受“援”国向这些“专家”提供种种享受和特权，加重对受“援”国的剥削，以减轻苏修国内的负担。这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寄生性的一种表现。

据报道，目前苏修派出的“援外专家”，多达数万人。这些“专家”在受“援”国俨如太上皇，享受着比在苏联国内远为舒适的生活待遇。他们除了向受“援”国拿取高薪之外，还享受完全免费的交通、医疗，免费占用环境最好、设备最齐全的寓所。连带去的家眷，也同样享受着种种优待。甚至这些“专家”每年回苏联度假的一切旅费开支，也要由受“援”国负担。他们的奢华享受，连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外“专家”，也自叹不如。据计算，一些发展中国家仅仅用在供养苏修“专家”的开支，通常要占“援助”总额的百分之二十，成了受“援”国一项十分沉重的负担。

一九七二年在古巴的苏修“专家”，多达三千名左右。这些人渗入到古巴经济领域的各个部门，享有种种特权。他们及其家属有专门的住宅区，如哈瓦那的福克萨、莱巴托柯里等。在那里，布满了豪华的建筑物。在马埃斯特腊山旅馆，还有专为苏联人开设的购买处。他们对古巴人限量分配的东西根本不用担心，可以随意买到各种各样的食品和日用消费品。

在马里的苏修“专家”，独断专横，作威作福，只知道榨取马里人民的血汗，却连本职工作都干不好。这些“专家”还虚报开支，甚至偷窃工厂仓库里的机器零件倒卖给私商，以供自己挥霍享乐。他们“援助”马里勘探石油，花了七八八年时间，只钻了一口井，钻井时，又实行“技术垄断”，不让马里人学技术。马里花掉了三千九百万美元，换来的结果却微乎其微。在马里迪亚穆水泥厂五年多的建设过程中，为这些“专家”花费了大量建设资金，仅别墅一项就达三十九万美元。马里人民揭露说，苏联“专家”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共产党人”，“是来为马里人民服务的”，事实上他们根本不关心人民的利益。他们认为，与苏联“专家”共事是“不幸的，悲惨的”，“净是浪费钱财”。

在巴基斯坦，对苏修派去负责卡拉巴钢铁厂技术鉴定的“专家”，协定规定要对他们提供国际上第一流旅馆的生活设备。

在印度，苏修的石油“专家”要求极高的生活待遇，花掉了印度大量的钱，却钻不出石油来。印度《民族前进》周刊讽刺地说：“因为请了俄国人，印度人不但没有任何石油

到手，还不得不付给俄国人优厚的薪金，酬劳他们没有找到石油。”

在孟加拉国的苏修“专家”，肆无忌惮地用拖网渔船到孟加拉湾捞取大量海虾，然后以高价卖给美国。事情发生以后，苏修的“顾问”团头目还满不在乎地说什么：“这批虾是苏联教员在苏联给的拖网漁船上捕来的，这有什么不行呢？”①

苏修援外“专家”的种种特权和享受，完全是对受“援”国的一种剥削，是受“援”国被迫向苏修支付的变相利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这种做法，同老牌帝国主义用来自国外的大量超额利润的一部分，去收买工人贵族，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

以上大量事实说明，苏修通过贵卖贱买、转口牟利和强令受“援”国给其“专家”以各种特权等办法，把所谓的“援助”变成了使人难以置信的高利贷。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已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食利国”、“高利贷国”。列宁指出：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从小规模的高利贷资本开始，而以大规模的高利贷资本结束。”（《列宁选集》第2卷第776页）历史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无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如何疯狂一时，但它终究摆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第四节 大做军火商，大发战争财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为了争霸世界，疯狂进行扩军备战，

① [美]《华盛顿邮报》1974年4月17日。

“把军备扩大到空前的规模”。（《列宁全集》第23卷第210页）庞大的军费开支，成了压在苏修身上的一个沉重包袱。正如恩格斯揭露十八世纪德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状况那样：“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的日益庞大的支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4页）于是向世界推销军火，做死亡的生意，用军火去赚取外汇，榨取高额利润，便成了苏修解救国内危机的重要手段。它打着“军事援助”的幌子，到处推销军火，大做军火商，大发战争财。

苏修从一九五五年开始涉足世界军火市场，但它的“军援”和销售军火的数字，从来都没有公布过。据不完全统计，从那时起到一九七三年，苏修出售的军火累计约达三百一十亿美元，其中亚非拉国家占了一半，而另一半的主要买主是东欧国家。据瑞典官方研究机构的材料，在五十年代后期，苏修只向第三世界的六个国家出售武器，每年约九千五百万美元，占世界军火出售量的百分之十一点三。到七十年代初期，苏修对第三世界的军火供应已扩及近三十个国家，销售量已占世界军火出售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超过了原来第一号军火商美国（美国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三），成为世界最大的军火商之一^①。

苏修以“军援”打掩护，大量销售军火，首先是为了政治和军事的目的，同时也为了攫取高额利润，赚取日益缺乏的外汇。军火是苏联的一项重要的剩余产品。法国《战斗报》

① 《人民日报》1973年11月27日、12月18日。

说：“苏联现在还能更多地出口的东西，就是它的武器。”军火生产又是一项得利快、盈利多的买卖。据《青年非洲》报道：“工业大国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售武器，每年从中获利近一百亿美元，大约等于它们以‘经济援助’名义分发的钱的两倍以上。”因此近年来，苏修加紧扩大军火输出，牟取暴利。

苏修的“军援”重点，除了它的那个“大家庭”成员外，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主要是中东和印度。据日本《东洋经济》报道，一九七一年，苏联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口的武器，仅埃及和印度两国就占了百分之八十。

苏修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军火输出，最先开始于中东地区。一九五五年九月，首先由捷克斯洛伐克出面，与埃及签订了一笔军火合同，供应一批苏式武器装备。这实际上是苏修对埃及提供“军援”的开始。

一九五六年十月，英、法、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进攻，这给苏修进一步出售军火带来了极好机会。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苏伊士战争停火后只有几天，苏修打着“反帝”的旗号，以补充埃及在战争中的武器损失为名，出现了向埃及提供“军援”，出卖军火的第一个高潮。在五十年代后期，苏修在中东地区的大型武器供应中，已占百分之四十。

一九六七年的“六·五”战争，给苏修向埃及提供“军援”、倾销武器造成又一个好机会，而且销售范围扩大到了中东其他国家。以后，由于两霸制造了中东“不战不和”局面，迫使一些中东国家持续不断地向苏修购买军火。到一九七二年为止，苏修对中东地区的武器销售额达到了五十三亿

美元^①。其对象主要是埃及，其次是伊拉克和叙利亚。

苏修在做军火交易的时候，为了谋取现金和暴利，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出来。一九七三年十月，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正当阿拉伯人民在前线浴血奋战时，苏修却乘机大捞一把。它不仅趁火打劫，以成倍的价格向中东国家出售军火，而且借机勒索，硬要中东国家以现金支付武器价款。据英国《每日快报》报道，苏修在这次战争中，卖给中东国家的武器总额达到七亿英镑（合十六亿美元）。埃及和叙利亚由于财政困难，自己无力支付这样庞大的军火价款，只能要求其他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帮助支付这笔费用。英《每日快报》说，一些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为了“使埃及摆脱完全依靠俄国供应武器的处境”，避免使埃及“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前景抵押在克里姆林宫身上的时间太长”，为埃及和叙利亚支付了一大部分“为购买这场宗教节日战争估价为七亿英镑的苏联武器……的钱”。《纽约时报》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九日援引“地位很高的欧洲银行界人士”的话说，由于“这笔费用很高，连富有的石油出口国手头也没有足够的现金来付”，所以“阿拉伯的一个主要石油出口国一直在向西方银行”“借一大笔贷款”，以偿还苏修“运给埃及和叙利亚的成千吨军事装备的钱”。然而，使人发指的是，苏修却把在中东出售军火所得到的大量美元，到西欧金融市场上放高利贷。据日本《产经新闻》转引美国《金融经营者》周刊的消息说，苏修竟把在中东出

① 香港《经济导报》1973年第40期第14页。

售军火所得的钱，“在欧洲货币市场上以超过百分之十的高利贷放给那些无钱购买石油及其他商品的国家。”苏修趁火打劫，敲诈勒索的无耻行径，充分暴露了它这个大军火商的卑鄙灵魂。

苏修对印度提供所谓“军援”，是从一九五九年印度扩张主义者挑起中印边界争端时开始的。苏修为达到反华的目的，向印度积极出售军火，供应了运输机和直升飞机，供印度在喜马拉雅地区使用。随着印度反华气焰的日益嚣张，一九六二年九月还同印度签订了购买和制造米格21型飞机的协定。而过去，苏修从来不向任何其他国家签发制造米格21型飞机的许可证。

一九六五年八月，印巴为克什米尔争端发生冲突，苏修又乘机对印度增加“军援”。之后，苏对印的“军援”不断增加。

一九七一年，苏修策划印度发动肢解巴基斯坦的战争。借此，苏修得到了出卖军火的大好时机。在战争期间，价值七亿五千多万美元的苏制武器^①，从空中、海路加速运往印度。这场战争使巴基斯坦分裂成了两个国家，而苏修这个军火商却大大地发了一笔战争财。据统计，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二年，苏修给予印度的“军援”在十二亿美元以上。印度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仅次于埃及的苏制军火市场。

只要能赚钱，苏修这个军火商对它的“大家庭”成员并不特别客气些。据巴西《圣保罗州报》一篇社论揭露，“事

① 《人民日报》1973年12月18日。

实是，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成员国、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也要象阿拉伯国家一样，用现金支付从这个监护国得到的武器。”

苏修不仅高价出售武器，而且把零件当做施加压力的工具。据一位非洲国家的陆军参谋长揭露，苏修“以数倍于武器本身的价格出售这些零件”^①。

列宁指出：“战争不仅给资本家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带来了进行新的掠夺（掠夺土耳其、中国等等）、接受价值数十亿的新订货、放出新的更高利钱的债款等的灿烂远景”。（《列宁选集》第2卷第639页）列宁在揭露美帝国主义大发战争财时又指出：“每一块美元都有污迹，都有使每个国家的富人发财、穷人破产的‘有利可得的’军事订货的污迹。”

（《列宁选集》第3卷第588页）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打着“军援”的幌子，大做军火买卖，大发战争财。它袭用了老牌帝国主义的故伎，或者挑动和策划战争，或者制造“不战不和”的局面，以便获得能给它带来新的掠夺，新的订货和新的更高利钱那个“灿烂远景”。人们可以看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每一块卢布，都同样沾有污迹。这个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帝国主义强盗，干的坏事越多，它的反动嘴脸就暴露得越充分。到头来，必将落得一个与老牌帝国主义一样的可悲下场。

① 《人民日报》1973年12月18日。

第三章 苏修利用“援助” 进行控制和扩张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810页）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在经济、政治、军事几方面，向世界各地加紧进行控制和扩张。

苏修的所谓对外“援助”，实际上就是对外进行控制和扩张的手段。正如列宁指出的：“资本输出这种特殊现象和非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商品输出不同，它同从经济上、政治上和领土上瓜分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列宁选集》第2卷第833—834页）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同老牌帝国主义一样，也是通过资本输出等方式，对外进行政治、经济控制和军事扩张。对所谓“大家庭”中的“兄弟国家”，苏修凭借着霸主和债主的地位，利用“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等一套枷锁，对这些国家进行严密的政治、经济控制和野蛮的军事干涉，把这些国家变为苏修直接控制下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对发展中国家，苏修打着“反帝”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以提供“援助”，进行“经济合作”和发展贸易为手段，加紧向亚非拉地区渗透和扩张，力图把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第一节 加强经济控制，竭力使受“援”国 为自己的经济附庸

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斗争中，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进行经济渗透和扩张。它打着“援助”、“合作”的旗号，渗入受“援”国的重要经济部门，控制受“援”国的经济命脉；大办“合股企业”，建立“国中之国”；推行所谓“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大搞什么“协调”计划，使受“援”国的经济计划完全服从于苏修的需要。苏修的种种伎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这就是：“力图扩大经济领土”，（《列宁选集》第2卷第804页）把受“援”国变为自己的经济附庸。

一、渗入受“援”国的重要经济部门， 控制受“援”国的经济命脉

苏修对“经互会”各国和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和“贷款”，标榜是用来“帮助”这些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使它们“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掠夺，而实际上却是用来控制受“援”国的经济，并使之成为依附于苏修的重要工具。

苏修通过“经济援助”和“无私贷款”，插手“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重要工业项目的建设，控制它们的经济命脉。据苏修《经济报》透露，截至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苏修通过“援助”，把魔爪伸进了“经互会”国家的一千零三项工业企业的建设工程。其中主要是电力工业、钢铁工业、有色金

属工业、机械和金属加工工业、化学工业和采煤工业。随着苏“援”的大量涌入，苏修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渗透越来越扩大，控制了它们的关键性经济部门。以保加利亚为例，据苏修报刊透露，苏修“专家”直接“参与”了保加利亚三百多个工业企业的建设^①。“苏联援建企业的产量占全国工业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黑色冶金业产品产量占百分之九十五，有色冶金业产品占百分之八十五，石油加工业和石油化工工业产品占百分之八十，发电量约占百分之七十，化学工业产品占百分之五十五，制浆和造纸工业产品占百分之六十”^②。

苏修打着“援助”的幌子，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为名，通过“贷款”和“援”建项目，把它的魔爪伸进广大的亚非拉地区，操纵受“援”国的重要经济部门。苏修对印度的经济渗透，就是突出的一例。苏修给印度的“经济援助”，集中在印度的“公营部分”的工业企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二年，印度的苏“援”项目共七十个，已建成并投入生产的有四十八项^③。其中主要有两个炼钢厂、两个铸钢厂、八个机器制造厂、两个炼油厂、十个水力或火力发电站、三个煤矿和一个洗煤厂等^④。据印度《观点报》揭露，受苏修控制的印度企业的产量，在印度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为：钢百分之三十，原油百分之三十

① 塔斯社索非亚1973年3月18日电。

② [苏]《对外贸易》杂志1974年第8期。

③ [印]《印度时报》1973年1月31日。

④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147页。

五，炼油百分之六十，电力百分之二十，重型机械百分之八十五，重型电机百分之六十。苏修在阿富汗“援”建的八十九个工程项目，已完成的有六十九个。一九七四年，在阿富汗的国营工业生产总值中，受苏修控制的企业的产值，占百分之六十以上^①。

为了控制受“援”国的经济命脉，苏修用尽了各种卑鄙手段。以下的几种，是苏修所惯用的。

第一，把持工程设计，控制建设大权。

苏修在帮助受“援”国建设工程项目时，趁机派出自己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垄断工程设计工作。他们不仅排斥受“援”国人员参加设计，而且要求在建厂期间取得全部控制权。受“援”国对工程设计，一点也不能插手，完全要听从苏修“专家”的摆布。例如，苏修“帮助”印度修建的波卡罗钢厂的工程设计，就是由苏联中央冶金企业设计院包办的。这个设计院，一手制定详细的工程报告，并坚持要波卡罗钢厂全部用他们的那一套设计，而原来参加设计的印度达斯图尔公司却被排斥在外。后来，尽管绘图等工作由印度斯坦钢铁公司的中央工程设计局担任，但这个工程设计局的双手被紧紧地束缚着，它不经过苏修机构的批准，就不能修改苏修机构制定的详细工程报告^②。

苏修利用它对工程设计“拥有决定性的控制权力”，把陈旧的工艺强加给受“援”国，以便为它那些质量低劣的机

① [苏]《对外贸易》杂志1975年第7期。

② 《人民日报》1973年11月9日。

器设备找到倾销的市场。由于苏修强迫受“援”国接受它的陈旧机器设备，致使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遭受巨大的损失。据印度达斯图尔公司调查，由于苏联方面坚持要采用他们所拟订的详细的工程报告，采取比较老的工艺，波卡罗工程的投资大大增加了。据印度《金融快报》的报道，在工程的第二阶段，“据估计，如果印度顾问能不受拘束地最充分地利用本国的设备，需要从苏联进口的设备将不会超过三亿卢比。但是由于俄国人拥有决定性的控制权力，进口的部件也许增加到价值七亿卢比以上。”

第二，垄断零配件和原料的供应，卡受“援”国的脖子。

对于苏“援”的工程项目，苏修不仅在建厂期间取得全部的控制权，而且在完工投产以后，还通过垄断这些企业的零配件和原料的供应，继续加以控制。由于苏修强迫受“援”国购买它的陈旧机器设备，因此这些设备的维修和零配件的补充更换，全都依赖苏修。如果苏修一旦停止零配件的供应，就会给受“援”国造成巨大的困难。《印度快报》抱怨说，“苏联把设备的维修和补充的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提供的零件越来越贵，也越来越难以得到”^①。苏修正是利用垄断零配件的供应，来控制受“援”国，而且从中攫取超额利润。

为了控制受“援”国的经济，苏修还以“援助”为名，在受“援”国建立一些要依赖苏修进口主要原料的企业。例

① [印]《印度快报》1971年1月29日。

如，苏修“帮助”埃及建设的贾哈马迪综合制铝厂，几乎全部原料都要从苏修和东欧进口。在印度，由苏“援”建设的米格飞机厂，其主要原料，如合金铝等，多半也是依靠苏修提供的。这种情况，在“经互会”各国，尤为普遍。苏修不仅早已垄断了东欧一些国家的原料和燃料供应，而且还认为“国际分工”为名，在东欧一些国家“援”建了主要原料要依赖苏修进口的企业。更恶劣的是，它还采取种种卑鄙的手法，阻挠别国建设利用本国原料资源的企业，强迫别国从苏修进口原料，以便于苏修长期加以控制。苏修在“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建设核电站的过程中，做得更加露骨。捷克斯洛伐克建设核电站的计划，是在五十年代末制定的。计划规定，电站于一九六〇年建成。可是这个电站一直拖到一九六四年才开始动工，其原因是，原先计划规定这个电站要用十五万瓩的重水减速天然铀反应堆装置，采用这种装置，捷克斯洛伐克可以利用自己丰富的天然铀资源，不必依靠苏修进口浓缩铀原料。这对捷克斯洛伐克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苏修为了控制捷克斯洛伐克，垄断其原料供应，以便卡它的脖子，就不准捷克斯洛伐克用重水反应堆装置，强令它改为轻水反应堆，从而必须从苏修进口浓缩铀原料。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的核电站，就完全被苏修所控制。近年来，苏修“援助”东欧的其他国家建造和正在建造十六个动力反应堆，也都采取了同样的手法，把这些国家紧紧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此外，苏修为了垄断别国的原料和燃料供应，控制别国的经济命脉，还采取种种卑劣手法，阻挠别国发展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例如，苏修极力反对印度在波卡罗钢厂建立用

于石油勘探的钢板轧制厂，因而使印度无法进行石油勘探和开发孟买高地。对此，印度报刊表示非常不满。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印度《组织家》周报说：“我们的俄国朋友也象旧时的英国统治者一样有着他们既得利益，因为他们现在是石油输出国，……因此，俄国对在印度寻找印度石油并不特别感兴趣”。

第三，操纵生产技术的重要环节，控制企业管理大权。

苏修以提供“技术援助”为名，派出大批“专家”和“技术人员”，渗入到苏“援”企业的管理机构，掌握企业的管理大权，力图把这些企业永远置于苏修的控制之下。由苏“援”修建的印度比莱钢厂，表面上归印度国家所有，而实际上是由苏修“专家”管理的。据《印度教徒报》透露，这座工厂建成后，还有六十名苏联人。形式上这座工厂是由印度人管理的，但有一个“平行的苏联机构”，“许多印度高级经理人员都有幕后的苏联经理人员”。报道指出：“有个苏联影子内阁至今控制着比莱钢厂的生产”。苏修“援”建的“索马里伯贝拉海军工厂几乎全是俄国人管理的，一直到清扫办公室地板的清洁工人都是俄国人”^①。苏修“援”建的马里迪亚穆水泥厂，管理大权全被苏修“专家”所控制。工厂要添置什么机器，竟然还需要征得苏修“专家”的同意。苏修在蒙古“援”建的企业，都是由它一手控制的。有的企业名义上虽已移交给蒙方，但实际上仍由苏修人员所把持，甚至连一些工厂的厂长和主要车间的主任，都是由苏联人担任。难怪外国记者早就讽刺地说：蒙古

① 《非洲秘闻》1978年7月6日。

是“苏联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了^①。

第四，强迫受“援”国用指定的物资偿还贷款，借以支配受“援”国的生产。

苏修的对外“援”建工程项目，实际上是一种有目的的投资。它“援”建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是为了攫取和控制石油和天然气；它“援助”勘探和开发矿藏，是为了获得大量的各种精矿；它“帮助”别人建立化工企业和各种轻工业，是为掠夺受“援”国的化工产品和各种消费品，等等。苏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斯卡奇科夫供认，“苏联参加建设的项目，其产品是双方都感兴趣的”^②。苏修为了从受“援”国掠得自己“感兴趣”的产品，在同受“援”国签订“援”建工程项目协定时，明文规定这些工程项目投产后，应将“生产的全部或部分产品用于向苏联出口”，以偿还苏修的“贷款”。受“援”国为了偿还苏修的债务，被迫按照苏修规定的规格、品种和数量来组织生产，并且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把产品运往苏联，而受“援”国本身则无权支配这些产品。苏修通过这种方式，不仅掠夺了受“援”国大量的工矿原料和各种消费品，攫取了巨额的利润，而且还控制了受“援”国的经济，进一步支配受“援”国的生产，把受“援”国的经济纳入苏修的生产计划之内。在印度，苏修“援”建的比莱钢厂所生产的产品，很大一部分运往苏联。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〇年期间，这个厂为苏修生产了六十万吨钢^③，根据一

① [日]《朝日新闻》1969年5月18—21日。

② [苏]《对外贸易》杂志1974年第5期。

③ 香港《经济导报》1972年第3期。

九七二年签订的一项协定，在三年内这个钢厂还要向苏修提供一百万吨钢①。印度一个年产五十万吨氧化铝的铝厂和一个年产五万吨己内酰胺厂，其全部产品都要运到苏联抵债。在埃及，苏修“援”建的炼油厂、钢带厂、塑料厂、制铝厂、制磷厂等工业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也被规定要用来偿还“贷款”。这种情况，不一而足。难怪苏修《真理报》评论员茹科夫曾得意洋洋地说：苏联“帮助印度建立工厂，印度将用这些工厂的产品来偿还我们。这是有前途和有成效的合作，因为印度没有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茹科夫在这里虽然说的是印度，实际上，对其他苏“援”国家也是一样的。

不仅如此，苏修还对受“援”国大搞所谓“定向”生产，规定受“援”国要开设一些企业，专门为苏修生产它所需要的产品，并以这些产品来偿还“贷款”。这不仅是为了掠夺和剥削这些国家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而且直接支配受“援”国的生产，控制它们的经济。例如，在印度正在建立一系列专门生产向苏修出口产品的工厂，以偿还苏修的“贷款”。印度《金融快报》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指出：“这种‘定向的生产’的搞法，将使苏联能够毫无道理地支配印度的工业，正如苏联对东欧国家经济的所作所为一样”。

二、效法西方“跨国公司”，在受“援”国大办“合股企业”

列宁指出：“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

① [印]《组织家》周刊1974年8月3日。

的国外联系和殖民地联系以及‘势力范围’的极力扩张，‘自然’就使得这些垄断同盟之间达成全世界的协定，形成国际卡特尔。”（《列宁选集》第2卷第788页）列宁的这段话，不仅深刻地揭示了国际垄断组织形成的历史，而且对于我们揭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大办“合股企业”的反动实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采用所谓“援助”和“经济合作”的形式，大量输出资本，疯狂进行剥削、掠夺、控制和扩张。但是这种形式有一定的期限性，随着债务的清偿，剥削特权将会随之消失。因此，它不能完全满足苏修增加资本输出和扩张势力范围的欲望。于是，苏修就打着“合作新形式”的幌子，效法西方“跨国公司”，向受“援”国直接投资，开办“合股企业”。把乔装打扮的“援助”形式，变为直截了当的资本输出。这样一来，苏修就从原先的债权国，变为受“援”国的企业主，直接参与剥削这些国家广大劳动人民的罪恶活动，长期垄断和控制受“援”国的经济命脉。目前，苏修同发展中国家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合办的这类企业，已遍及开采工业、加工工业、贸易、运输等重要经济部门。

早在一九六四年，苏修有些出口公司就与尼日利亚商人合办了一个“西非汽车工程公司”。在其资本总额中，苏修占百分之六十，尼商占百分之四十。公司的董事长、财务等重要职务，都被苏方所控制。这家公司的总部设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在尼的其他九大城市都有分公司。苏修通过这家公司，向尼日利亚推销苏修的汽车、柴油发电机、水泵和

农机等。一九六六年，苏修动力机械出口公司同埃塞俄比亚的密立亚列斯·巴巴菲力普有限公司在埃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合股开办了“埃苏贸易有限公司”，下设六个公司。一九六七年始开始营业，经营苏制拖拉机、轿车、卡车、柴油机、焊接设备、电动机、自行车等。最初，这家公司资本总额为二百多万美元，苏修占百分之五十一。总经理由苏联人来担任。随着苏修投资的增长，资本总额增加到五、六百万美元，埃方所占的股份只剩很小一部分。最后，不得不全部转让给苏修，成了苏修独家经营的企业。在新加坡，由泰国、新加坡和苏修合营的名为“泰新苏”的航运公司，于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正式开始营业。这家航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二百万铢，其中披尼父公司的股份占百分之五十一，苏联和新加坡航运公司的股份占百分之四十九。苏方参加的代表是国营敖德萨航运组织。这家“泰新苏”航运公司的董事长披尼立那瓦说，苏联的参加，是他经营的披尼父子公司同苏联和新加坡航运公司协作了十三年的结果^①。在东南亚，苏修通过“莫斯科人民银行”新加坡分行对东南亚国家一百多个企业进行投资，并与印尼商人共办“合股企业”。据报道，一九七一年，这种投资数为二十万美元，一九七二年上升到二百万美元，一九七三年增到一亿美元。这家银行以棉兰为重点，向雅加达的某印刷机器商和一家烟草制造业提供“贷款”，并支持加里曼丹资本家与新加坡资本家合营的采木企业^②。在伊朗，

① 曼谷《民族报》1974年1月29日。

② 香港《经济导报》1972年12月13日。

苏修同伊朗合股开办的“苏伊运输混合股份公司”，苏方资本占一半^①。据报道，苏修对秘鲁一家渔业加工联合企业投资为一百八十万美元。在巴西，苏修向一家公司“贷款”达二亿五千万美元^②。

在“经互会”的一些国家，已建立起许多“跨国公司”。苏修为了掠夺捷克、东德、匈牙利等国的铀、钨、锌等战略原料，都直接参加了投资^③。保加利亚计委主席在苏修《真理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透露，目前苏修在保加利亚的“合股企业”有：保苏矿业公司、保苏船舶公司、保苏建筑公司和保苏航空公司等^④。在蒙古，苏修不仅“合股”参加开发铜、钼矿，成立蒙苏有色金属联合公司，而且还“合股”参加地质勘察，控制了蒙古整个矿藏资源。在苏蒙额尔登丁敖包选矿洗矿联合企业中，蒙方的“投资”也是由苏修给予“贷款”来解决的。因而，这个“联合企业”实际上是苏修在蒙古的土地上经办的垄断企业^⑤。在靠近苏蒙边境的蒙古境内，还有苏修独资经营的大型肉类、皮毛加工厂。

为了进一步兜售这种“合作的新形式”，苏修派出许多代表团，窜到亚非拉国家大肆进行活动，劝说它们同苏修“合作”，开办“合股企业”。据印度《联系》周刊一九七

① 伊朗《消息报》1971年10月26日。

② 捷克《日报》1972年3月18日。

③ 香港《经济导报》1973年第41期。

④ [苏]《真理报》1971年11月2日。

⑤ 塔斯社乌兰巴托1973年2月20日电，[苏]《真理报》1973年3月4日，塔斯社布拉格1973年6月6日电。

三年十二月九日报道，苏修向印度建议：“苏联可以在印度建立工厂，作为生产印度所需要的象机械制品这样货物的一种共同努力。产品的一部分由两国分享，其余的可以出口”。印度《观点》周报还揭露，苏修为了同印度财阀经营“联合企业”，列举出一百三十个项目，提供印度技术发展协会总裁“征询”意见。苏修还表示，它有兴趣同印度的私营企业缔结双方联合经营的协定。印度《经济时报》就此发表评论说：“这是苏联在过去二十五年同这个国家经济合作过程中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据美国《新闻周刊》透露，苏修也“正在极力劝说我们的实业家参加在拉丁美洲的联合企业”，力图同美国在拉丁美洲的资本相勾结并共同分享利润。在哥伦比亚，苏修一些企业的代表，和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谈判数额达数百万美元的长期合同。全苏动力机器出口公司的代表也与美国温索尔内燃机公司商谈了在哥伦比亚联合投资三千万美元的交易。这家《新闻周刊》还说，为了确保与美国公司相勾结，“俄国人正强调，他们可以提供长期贷款，并且（苏联）从美苏在拉丁美洲的联合企业中赚到的美元的大部分，将由苏联在美国花费使用”^①。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报道，苏修打算在埃及直接投资开办制鞋、无线电、冰箱等耗费劳动力的企业，其产品将运往苏联。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样热衷于大办“合股企业”，就是因为，这种国际垄断组织，无异于“国中之国”，它最便于苏修在经济上掠夺别国的财富，在政治上干涉别国的内政。

^① 阿通社地拉那1973年7月28日电。

所以，苏修把它作为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得力工具。

三、推行“国际分工”，使受“援” 国成为苏修的经济附庸

早在六十年代，苏修就假借“援助”和“合作”之名，强行在“经互会”国家推行“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迫使这些国家按照苏修的需要，改组本国的工农业生产结构，放弃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的权利，把它们置于附庸的地位。

按照苏修的所谓“国际分工”原则，工业落后的国家要重点发展农牧业；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也不必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只发展一些苏修所需要的工业部门，根据苏修所规定的品种、规格和型号进行生产。当苏修的需要发生变化时，这些工业部门还要随之改组，以满足苏修的需要。所以，这种“国际分工”，实际上就是“苏联工业，别国农业”，或者是“苏联工业，别国附属加工厂”。

由于苏修强迫推行“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东欧一些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改组了自己的生产结构，从苏修进口原料，生产苏修需要的产品，然后再运到苏联，成为苏修的附属加工厂。例如，东德被迫按照苏修的需要改组工业结构，先后把六十家纺织工厂改建为电机厂，放弃了传统的飞机、拖拉机和大汽缸汽车制造工业，限制了黑色冶金工业；捷克斯洛伐克停止发展本国的石油和锰矿开采业；匈牙利放弃普通卡车和一千五百吨以上船只的生产，以及传统的收音机制造工业，改而发展“分工”给它们的其他工业。苏

修不仅强迫这些国家改组了工业体系，而且规定它们只许生产某些机器设备，专供对苏出口。例如，东德要向苏修提供六角车床、自动磨床、锻压设备、建筑材料工业设备、吊车、冷藏工业设备、电器设备、化工设备、精密仪器等；捷克斯洛伐克要向苏修提供金属切削机床、轧钢设备、瓦斯透平联动机、电车、通讯设备等；波兰、匈牙利要提供民用船只和船舶设备等。对于这些国家所生产的产品规格、品种，也要由苏修来具体规定。苏修给这些国家规定：在十八种规格的榨糖设备中只能生产一种；在一百五十种型号的金属切削机床中，只能生产十七种^①。同时，苏修还不让这些国家生产一部完整的机器设备，如不让匈牙利生产拖拉机，而只生产拖拉机的配件；要捷克斯洛伐克生产小汽车的汽化器和喇叭，保加利亚生产小汽车的车身和蓄电池，而不能生产一部小汽车。

可是，当东欧一些国家按照苏修的规定改组了生产之后，过不多久，苏修因为自己的需要发生了变化，又强令这些国家重新改组生产。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例，按照原先规定，捷克斯洛伐克生产对苏出口的干线电力机车和无轨电车。后来，苏修又按照自己的需要，要求捷克生产别的项目。苏修驻捷大使馆参赞谢苗诺夫在一次讲话中说：因为苏联今天“已经完成了铁路电气化计划”，无轨电车已不适应苏联“城市交通发展的方针”，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机车的需要量下降了”。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必须改而生产其他“新的项目”。

① 香港《经济导报》1973年第41期。

苏修的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给捷克斯洛伐克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苏修还在“国际分工”的幌子下，规定“经互会”一些工业不发达的国家，为它提供各种农副产品，以满足苏修的需要。

按照“国际分工”的要求，保加利亚被迫减少谷物播种面积，而着重“分工”生产蔬菜、水果和烟草等经济作物，它所需要的粮食则由苏修来提供。据苏修《经济报》透露，多年来，保加利亚出口的新鲜蔬菜的一半以上，罐头蔬菜的三分之二以上，水果的三分之一和几乎全部的烟草，都是运往苏联。实际上，保加利亚已成为苏修的“果菜园”。

“国际分工”规定，蒙古要着重发展它的畜牧业，成为苏修的大畜牧场。苏修在同蒙古接壤地区建立了大型肉类联合加工厂，蒙古每年把大量的活牲畜源源不断地赶往苏修的加工厂。

苏修还通过所谓“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强使古巴迄今仍保留着以产糖为主的单一经济。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在一九七二年三月的一次报告中说：蔗糖“是一种生产率非常低的农业生产”，但是“我们过去必须发展我们的糖业计划，因为归根到底，糖是我国经济中产值相当高的唯一产品。此外，我们必须有一种生产，使我们向苏联提供大量的糖以弥补一点苏联对古巴的出口”。由于“国家经济注意力基本集中在糖业计划中”，结果造成“生产数字和农牧各部門都在下降”，“国家的经济活动遭到了最严重的破坏”。可见，苏修推行的“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已给古

巴带来十分惨重的后果。近年来，古巴政府为了摆脱这种困难的局面，提出了一个综合发展经济的设想，要逐步实现“国民经济多样化”。但在一九七二年的苏古会谈中，受到苏修的责难和反对。一九七三年，苏古签订的五年“贷款”协定，苏修的“援助”重点，仍放在糖业生产上。这就是说，古巴要继续作为苏修的甘蔗园，长期供应苏修以大量的食糖。

苏修推行“国际分工”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就是建立“超国家”的“经济合作组织”或“国际经济联合公司”，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无所不包的国际垄断组织——“国际经济综合体”。根据苏修和东欧一些国家报刊的报道，目前已经迫使“经互会”国家建立的“经济合作组织”或“国际经济联合公司”，主要有：“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国际投资银行”、“国际冶金工业合作组织”、“国际化工工业合作组织”、“滚珠轴承工业合作组织”、“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动力组织”、“运输电讯合作组织”、“铁路合作组织”、“货车车厢总库”、“国际原子仪表公司”、“国际电子技术设备联合公司”、“国际纺织机械联合公司”、“国际原子能发电设备联合公司”和“国际标准仪器联合公司”等等。这些“经济合作组织”，不仅涉及面广，而且都集中在经济要害部门。它们都是一些“超国家”的经济机构，其实权都掌握在苏修手中。苏修通过这些“超国家”经济机构，直接控制了“经互会”国家的财政金融、工业生产、动力交通等经济命脉，从而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计划、投资、产销、原材料供应和经营管理等方面，都处在苏修严格控制之

下。例如，苏修通过“国际冶金工业合作组织”，直接掌握东欧一些国家从采矿、生产、销售到高炉建设等冶金工业的全部过程。苏修还企图通过这些“经济合作组织”，进而为建立“国际经济综合体”打下基础。所谓“国际经济综合体”，就是高度垄断的大型联合企业。这种企业将按照“共同”的“国际计划”来经营，在劳动力、财政金融、产品、劳务等方面可以“自由流动”。也就是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劳动力的安排和财政预算的分配等等，都将完全控制在苏修的手中。这种“综合体”一旦建立起来，什么“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什么“国家独立”，统统都成为超级废话。

苏修还竭力把“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强迫受“援”国同它进行“经济合作”，专门生产苏修国内不能生产或利润低的产品，以及劳动强度大的加工项目，以满足苏修的需要。苏修头目公开宣称：“对苏联来说，这种合作，还为更广泛地利用国际分工的优越性提供更多的可能性”^①。他的所谓“优越性”，就是由苏修出原料，受“援”国按苏修规定的规格、品种和数量进行生产，成为苏修的附属加工厂。从印度那里，可以看出这种“优越性”的真相。苏修通过“经济援助”，在印度建立了一些钢铁、机械、动力等重点工业。这些工业要按照苏修规定的规格、品种和数量进行生产，并以规定的价格售予苏修。一九六七年，印度为苏修生产的机械产品价值三千二百六十二万卢比，

① 柯西金在苏共二十三大的报告。

到一九六九年已猛增到一亿四千一百三十五万卢比，增加了三倍多^①。苏修还向印度出口棉花、木材等，由印度加工制成棉布、木器运往苏联。根据苏印签订的一项合同，印度每年要为苏修加工两万吨棉花。据印度《金融快报》透露，一九七二年，印度是在“蒙受至少二千万卢比的损失”的情况下，完成了这项二万吨棉花的加工任务的。

苏修就是这样地利用“国际分工”，来榨取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进一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四、大搞“协调”计划，把受“援”国的 经济计划纳入苏修的轨道

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是每个独立国家主权内的事情。但是，苏修为了加强对别国的经济控制，十多年来，一直要求“经互会”各国同苏联“协调”国民经济计划。苏修叫嚷，只有进行“协调”，经济“合作”才能“更深远，更有效”。所谓“协调”国民经济计划，就是“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国民经济计划，要同苏修的经济计划相“协调”，凡是苏修需要的，都要列入计划，按质、按量、按时进行生产；凡是苏修不需要的，都要削减或停止生产。所以，这种“协调”，实际上就是把“经互会”各国的国民经济计划纳入苏修的经济轨道。这种“协调”计划的结果，使一些“经

① 香港《经济导报》1972年第3期。

互会”国家被迫放弃传统的产品生产，关闭新建的工厂，或者按照苏修的需要改建大批工厂，这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且在经济上越来越依附于苏修了。

为了使各国的计划能够“协调”一致，苏修提出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计划机构”。早在一九六二年，苏修中央全会就正式提出要“建立一个包括‘经互会’各成员国代表在内的各国共同的统一计划机构”。这样的计划机构建立后，苏修就可以利用在这个机构中窃取的权力，控制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方向，规定每个成员国的自然资源勘探，“统一”动力系统的建立，水利资源的利用，机器制造、化学、冶金等工业以及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同时，还可以规定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比例。

自“经互会”成立以来，苏修迫使东欧各国“协调”了从一九五六到一九七五年期间的四个五年计划。在“协调”计划的程序上，前两期是各国先制订本国的五年计划，然后再与苏修的五年计划“协调”，后两期则是先进行“协调”，再制订本国的计划；在“协调”计划的范围上，开始只限于机器制造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几个主要工业部门的某些产品，后来则几乎包括了“经互会”成员国所有的国民经济部门，而且连科学技术研究的计划，也要进行“协调”；在“协调”工作的机构上，初期只涉及成员国的国家计委，而现在则涉及到部、局、联合公司和企业。通过这四个五年计划的“协调”，苏修一步步地加强了对“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控制。

在“经互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苏修经过了精心策划，

抛出了一个所谓“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综合纲要”，以加强“计划工作领域内的合作”，“进一步完善国民经济”的“协调工作”。根据“综合纲要”的规定，制定一个十五年到二十年的长期远景计划。这个计划，不仅期限长，而且计划项目多，范围广。计划规定，东欧一些国家要出人出钱出技术，在苏联领土内搞所谓“联合建设生产能力”，为苏修开发原料和燃料动力基地投资卖力。苏修以此作为向这些国家供应有关工业原料和燃料的先决条件。

根据长期计划规定的“合作”项目，在“协调”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计划过程中，苏修同东欧一些国家签订了大量的双边协定和多边协定。其中包括的主要项目有：在苏联西伯利亚的乌斯特伊利姆地区，建设一座年产五十万吨的大型纸浆联合企业；在俄罗斯中部的库尔斯克地磁异常区，建设一座年产一千二百万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在西伯利亚的布拉茨克，建设年产二千万平方米的木纤维板工厂；铺设从乌拉尔河畔的奥伦堡到乌克兰西部国境的长约二千七百五十公里的天然气管道。此外，还有卡拉图黄磷厂、基叶姆巴耶夫石棉选矿厂，以及钛、铜和镍的露天采矿和选矿等项目。建设这些项目所需要的机器设备、管子和材料，以及稀缺的消费品和其他商品，大部分由东欧一些国家以“专用贷款”的方式，或者是以提前偿还苏修“贷款”的办法提供的。东欧一些国家还要为此提供大量的劳动力，仅为敷设苏联境内的奥伦堡天然气管道，东欧五国就得派出两万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东德是一个劳动力十分缺乏的国家，也不得不派出三千二百人去苏联境内劳动。据东德《统一》杂志报道，

“敷设一公里天然气输送管道需要大约五百万至六百万马克的投资。”为了敷设这条管道，东欧五国要出一百三十七亿到一百六十五亿马克的投资。由于东欧国家被迫为苏联境内的建设出钱出力，它们本国的建设项目不得不一再削减或下马。捷克斯洛伐克上一个五年计划的基建任务就没有完成，一九七五年又被迫砍掉二十四个新项目。其他国家也受到类似的影响。

苏修搞这一手，有着一石数鸟的目的。其一，苏修利用东欧一些国家的原料、燃料和动力都要仰赖它来供应，便借口建设这些企业投资量大，必须由各国平均分摊资金，强迫东欧一些国家拿出大量资金，供苏修进行建设。这样，苏修既转嫁了国内的经济危机，又增加了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其二，苏修垄断了这些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把它作为自己手里的一张“王牌”，谁不跟着苏修的指挥棒转，苏修就卡谁的脖子，从而加强了对东欧一些国家的控制。其三，苏修还通过高价出售这些企业的产品，从东欧一些国家榨取超额利润。

苏修还把这套所谓“协调”计划，推广到发展中国家。一九七二年九月，苏印在莫斯科签署协定，印方同意把印度从一九七四年开始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同苏修的第九个五年计划“配合”起来。一九七三年年底，印度同苏修签署了四项重要协定，其中一项是关于两国政府计划部门之间进行“合作”的协定。据苏修一位高级官员说：“协定中采纳的计划工作原则是苏联的原则，印度人接受了。实质上这意味着至少在今后十五年内印苏在计划工作方面将进行极其密切的合

作”^①。这项协定规定，在苏印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内，设立一个“印苏联合研究小组”，其主要任务是研究两国的经济前景，年度、中期和长期计划，工程项目和计划的拟订，原料计划供应等等。其结果，印度经济将进一步被纳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经济的轨道。印度人民同盟主席阿德瓦尼就印苏签署的这项协定发表声明说：“关于印苏计划机构合作的协定，实际上是经互会式的使计划相吻合的另一种办法，这样，印度就将主要是苏联的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供应国”^②。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援助”、“合作”幌子的掩盖下，拼命渗入别国的重要经济部门，大办“合股企业”，推行“国际分工”，大搞“协调”计划，都是为了要控制别国的经济命脉，把别国变成自己的经济附庸。列宁指出：“要使一个国家居于殖民地从属地位，除了直接在国家法权上，还要在财政、经济等方面使它居于从属地位”。（《列宁全集》第31卷第189页）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竭力加强对别国的经济控制，是它对外实行殖民扩张的一个重要步骤。苏修一旦把别国变成自己的经济附庸以后，即使这个国家仍暂时保留着形式上的政治独立，但这种独立是不完全的，不巩固的，必然会有丧失政治独立的危险。因此，苏修实行经济渗透的最终目的，不仅要在经济上，而且要在政治上、军事上，把别国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它“居于殖民地从属地位”。

① [美]《华盛顿邮报》1973年12月1日。

② [印]《祖国报》1973年12月3日。

第二节 加紧对受“援”国的政治控制和军事扩张

苏修叛徒集团是一群贪得无厌的豺狼。在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中，他们决不会满足于对别国的经济控制。列宁指出：“……对于金融资本最‘方便’最有利的当然是使从属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上的独立这样的支配。”（《列宁选集》第2卷第802页）为了取得这种最“方便”、最有利的支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以百倍的疯狂进行政治控制和军事扩张，力图把别国变成自己的附属国和殖民地。

所谓“援助”和“合作”，是苏修对外实行政治控制和军事扩张的手段。苏修的对外“援助”和“合作”，都附有种种政治的和军事的条件，而且，它还经常以债权国的地位，干涉受“援”国的内政，侵犯受“援”国的主权，极力扩张自己的霸权和势力范围。

一、干涉受“援”国的内政，侵犯受“援”国的国家主权

苏修的对外“援助”，是套在受“援”国脖子上的一条锁链。这种所谓“援助”，对受“援”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不仅毫无帮助，相反，伴随着这种“援助”而来的，是向受“援”国要特权、要基地、施加政治压力。苏修就是假“支持”、“援助”之名，行干涉、控制、侵略和扩张之实。

（一）以提供“军援”为手段，对阿拉伯国家抗击以色列

侵略进行种种限制和破坏，侵犯它们的国家主权。

苏修利用阿、以之间的紧张局势，对阿拉伯国家提供大批的“军事援助”。但其目的，绝不是为了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而是为了控制中东国家，争夺中东的石油和战略要地。人们从苏修对埃及提供“援助”的事例，可以充分看出它的狼子野心。

一九六七年“六·五”战争后，苏修乘人之危，打着“援助”和“友谊”的幌子，大举向埃及渗透扩张。苏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埃及提供大批的“军援”物资。但苏修卖给埃及的武器是附有苛刻条件的，不仅是高价推销，伸手向人家要基地、要特权、要资源，而且还附有种种的限制。例如，不卖给进攻性武器；不供应充分的弹药和零件；不许收复失地；卖给埃及的武器，必须取得苏修的同意才能使用；有些武器则根本不交给埃及，而是控制在苏修人员手里。据《阿拉伯世界》周刊报道，苏修公开威胁说，阿拉伯国家不要“采取军事解决办法”来反击以色列的侵略，否则，就会引起美苏“对抗”，爆发“世界大战”，并“导致（阿拉伯）进步政权被消灭”。由于这些苛刻条件和各种限制，苏修高价卖给埃及的武器，对于埃及人民抗击以色列侵略，实际上是一堆不起作用的废物。正如突尼斯《行动报》所揭露的：苏联领导人供应这些武器的唯一目的，是要控制阿拉伯国家，而不希望这些武器用到叙利亚或阿拉伯世界反侵略的战争中去^①。

① [突]《行动报》1974年10月10日。

苏修明目张胆地践踏埃及的主权，蓄意破坏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激起了埃及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一九七四年五月，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对黎巴嫩《事件》周刊的主编谈话时，揭露和谴责了苏修利用“援助”来控制埃及的阴谋。他说，苏联人在向埃及提供“援助”时“粗暴而拙劣的做法，使人感到他们要把一切指挥权都弄到他们手里去”。他还揭露：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苏联领导人答应向埃及提供一种特别的、能够袭击以色列纵深地区的飞机。但是“纳赛尔一直看不到这些飞机到来。”一九七一年三月，他本人以总统的身份访问莫斯科，在同苏联领导人会谈时提到上述飞机问题。“苏联领导人说：‘我们准备给你们提供这些飞机，但条件是在我们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你们决不能使用’”。苏修这种干涉埃及内政的无理要求，激起了埃及人民的极大义愤，萨达特总统坚决“拒绝以自由的代价来取得苏联的飞机”。

苏修阴谋使阿拉伯国家长期依附于自己，任凭它的摆布，因而伙同美帝在中东制造了“不战不和”的局面。美国《华盛顿邮报》1974年11月16日指出，“俄国人宁愿中东处于一种（有利于苏联打进去的）有控制的紧张状态，而不愿意它处于和平状态”。每当阿拉伯人民奋起反击以色列的侵略，突破中东“不战不和”的僵局时，苏修就伙同美帝挥舞强权政治的大棒，策划停火阴谋，把阿拉伯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烈火扑灭下去。

对于一九七三年反对以色列侵略的十月战争，苏修极力加以阻挠和破坏。事先，苏修在武器供应上以种种的卑劣手

法卡埃及，战争开始后，苏修又是“声明”，又是“讲话”，兜售“政治解决”，并向埃及逼债，要埃及同意其军事“专家”卷土重来。苏修头目柯西金还急急忙忙跑到开罗，压埃及接受停火。在中东“就地停火”决议通过后，苏修还企图通过所谓“监督停火”把军队开进中东，对阿拉伯国家实行事实上的军事占领。

十月战争结束以后，苏修出于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竟然完全停止供给埃及任何武器，并停止向埃及提供苏制武器零件和检修飞机发动机的手段。苏修还摆出一副凶狠的嘴脸，向埃及逼债索利，要求埃及每年拿出四亿美元左右来还本付息。

苏修还用停止提供武器作威胁，来限制和破坏巴勒斯坦游击队反击以色列侵略的斗争。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俄国对巴勒斯坦游击队说，除非他们在停火期间停止攻击以色列，否则他们就不能再得到武器”。

以上种种事实，充分暴露了苏修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援助”和“友谊”，只不过是它谋取各种特权、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别国主权的手段。黎巴嫩《生活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所谓的友谊，被夸大了作用和意义的这种援助，是给阿拉伯世界带来无数痛苦、灾难，使它们遭到蔑视和屈辱，失去土地和尊严的最重要原因”。

(二) 出枪炮，出顾问，公然策动战争，肢解巴基斯坦主权国家。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印度的控制，并同美帝争夺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

策动和支持印度发动肢解巴基斯坦的战争。这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在南亚次大陆的重演。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苏修就选中印度作为它向南亚扩张的重要据点。苏修利用印度当权者对邻国的扩张野心，大力加以扶植，对印度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逐步把它的势力渗透到印度的各个领域。一九七一年八月，苏修为了加紧向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扩张，同印度签订了名为“和平友好合作”，实为军事同盟的条约。苏印条约签订后，苏修即向印度运去了五千吨武器，并增派了“教官”，大大助长了印度扩张主义者的侵略气焰。接着他们又秘密勾结，加强对巴基斯坦的颠覆、干涉和侵略。条约签订仅仅三个多月，苏修就公然策动和支持印度发动侵略巴基斯坦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苏修把价值七亿五千万美元的飞机、坦克、导弹等武器，源源不断地向印度输送，并派出“顾问”助战，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印度加以支持和鼓励。苏修实际上成为肢解巴基斯坦，侵犯其国家主权的罪魁祸首。苏修把支持印度发动这场肢解巴基斯坦的战争，当作它进一步控制印度，加紧向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进行扩张，进而同美帝争夺霸权的大好时机。

苏修在肢解巴基斯坦以后，还继续对这个主权国家进行干涉和颠覆。它通过各种途径，偷偷向巴基斯坦分裂分子运送大批武器，秘密为他们进行“游击战”训练，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苏修为了加紧同美帝争霸印度洋，继续在南亚次大陆制

造动乱。一九七四年九月，它又支持印度吞并另一个主权国家锡金。这一事件，使许多国家都进一步认清了苏修的侵略本性。正如巴基斯坦《建设报》指出的：“如果苏联不怂恿印度，不替它的侵略打掩护，并撤回对印度的军事支持，印度决不敢吞并独立的主权国家。”

（三）利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霸主和债主地位，恣意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

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古巴，表面上虽有一套完整的国家形式和机构，而实际上却是苏修大帝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正如列宁所说的：“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

（《列宁选集》第2卷第805页）长期以来，苏修利用霸主和债主的地位，加紧对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进行政治和军事控制，甚至公然进行军事干涉和军事占领，推行新殖民主义统治，把这些国家当作自己的领地。苏修驻在“兄弟国家”的大使，实际上是这些国家的“太上皇”。他们直接操纵这些国家的人事变动，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苏修的一个小小的参赞，就可以对捷发号施令。苏修驻保加利亚的大使，可以否决保加利亚共产党首脑日夫科夫的决定。实际上，这个大使成了莫斯科的保加利亚总督^①。保修头目日夫科夫生怕一旦得罪了主子，就会被一脚踢开。他曾对人说：“如果我反对保苏‘友谊’，马上就会把我撤职”。苏修驻蒙古的大使馆，完全操纵了蒙古的内政和外交。苏修

① 合众国际社索非亚1971年4月25日电。

还通过所谓“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各种会议，对这些国家进行控制和指挥。

二、控制受“援”国的军事机构， 操纵军事指挥大权

苏修通过“军事援助”，把魔爪伸进受“援”国的军事机构。随着苏修军火的涌入，大批的苏修军事“顾问”接踵而至。他们不仅力图控制受“援”国的军事要害部门，而且还把军事“顾问”渗入到受“援”国军队的最基层组织，操纵其军事活动。甚至连武器装备、弹药供应、军官训练等都要加以控制。正如泰国舆论指出的：苏修“对发展中国家的武器援助，其实是‘军火生意’和以专家、顾问及教练员的方式控制受援国的军队”^①。

(一) 乘出卖军火之机，派遣大批军事“顾问”，钻进受“援”国的军事机构，控制它们的军队。

在埃及，一九六七年“六·五”战争以后，随着大批“军援”物资的涌入，苏修乘机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和“专家”，钻进埃及的军事机构，控制埃及的军队。据报道，苏修派到埃及的军事“顾问”和“专家”，曾达四、五千人，一般都被派到营一级的单位，有的甚至派到基层连队。他们指手划脚，妄图一手操纵埃及的军事作战计划、训练和装备，及一切军事活动。在这些苏修军事人员中，还夹有大量间谍，专门搜集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

① [泰]《亚洲新闻评论》1973年10月5日。

情报，进行颠覆活动。阿拉伯报纸指出，这些“顾问”和“专家”是苏修安插到埃及内部的“特洛伊木马”。

苏修还通过“军事援助”，在埃及部署了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人的导弹部队，还有约二百名空军驾驶员在埃及值勤^①。苏修军队在埃及控制几十个萨姆3导弹发射场，驾驶着上百架米格21型和米格23型战斗机。

一九七二年夏天，埃及赶走大批苏修军事人员后，苏修一面施展手段，企图“缓和”埃苏矛盾，以保住已有的阵地；一面又加紧向叙利亚提供“军事援助”，把一部分被赶出埃及的军事人员，转移到叙利亚，渗入到这个国家的军事机构中去。

索马里拥有的九个机械化步兵营、四个坦克营和一个突击队的陆军，几乎都是靠苏修装备的。索马里空军所使用的战斗机也由苏修提供。据估计，从一九七〇年以来，苏修向索马里运交八亿多美元的军需品。苏修通过对索马里提供武器装备，派出大批“教官”和“顾问”，渗入到它的军事机构中去。据外电透露，在一万五千人的索马里武装部队中，就有五千名苏修的军事“顾问”，平均每三个索马里军人就有一个苏修“顾问”。

在印度，自一九六五年美帝停止对印巴的军事“援助”后，苏修便加强对印度的军事扩张，成为印度的第一大“军援”国。据报道，“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九年的五年中，印度所得到的所有重武器中，苏联武器占百分之八十”^②。目前，印

① [英]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1970年研究报告》。

②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军火贸易》。

度海陆空军的军事装备，大部分是由苏修提供的。苏修通过提供军事物资，乘机派出大批军事“顾问”，渗入印度的军事机构，训练印度的海陆空三军，控制印度的军队。在印度的军队中，苏“援”的军事装备和零配件的使用，完全掌握在苏修手中，其中，控制最严的是“空军的米格飞机和米尔式直升飞机，还有陆军中的重炮和坦克”^①。苏修还常以扣发零备件作手段迫使印度就范。如对苏修提供的直升飞机和米格飞机，常把“至关紧要的备件”扣着不发，以致有些飞机只好停止飞行。苏给印的一三〇毫米大炮，也扣发炮筒备件。对此，印度报刊表示非常愤慨。《印度斯坦旗报》说：“如果爆发战争，我们用苏联装备只能打十天，在战斗开始的第十一天，我们就将不得不到莫斯科去乞求备件。”

阿富汗军队的武器装备，全部是由苏修提供的。随着苏修军事装备的进入，军事“顾问”也随之而来。阿富汗军队的一切军事活动，包括武器装备、弹药供应、军官训练、军队服装的制作等，都要听命于苏修“顾问”。

古巴是苏修在拉美的一个据点。苏修通过“军事援助”，把大批军事人员派到古巴。据报道，苏修驻古巴的军事人员共有二千五百至三千人，并有一支由海军特种机动部队作补充的现代化的火箭部队。英国《冲突》杂志一九七三年五月一期透露，在古巴“军队中，现在在下至营级的所有部队中都有苏联军官，仅在参谋部中就有五十多名苏联顾问”。苏修的军事人员操纵和控制了古巴的军队、武器装备和重要的军事设

① 〔印〕《印度斯坦旗报》1970年8月12日。

施。

（二）利用“华沙条约组织”，对东欧一些国家实行严密的军事控制。

苏修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竭力加强对东欧一些国家的军事控制。“华沙条约组织”就成为苏修对东欧一些国家的军事控制和军事占领，以维护其殖民统治的工具。十多年来，苏修完全控制了华沙条约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联合司令部的总司令、参谋长，以及各军种的司令员，都是由苏联人担任，而其他成员国的代表只能担任副职。在联合司令部内，苏修军事头目发号施令，其他成员国代表则只能唯命是从。苏修掌握了联合司令部的权力，实际上就控制了东欧一些国家的军权。苏修军事人员还以“联合司令部代表”的名义，常驻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参与驻在国军队的各种活动，直接操纵和干预驻在国军队的内部事务。苏修还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和“专家”，打入一些成员国的军事部门，对这些国家的军队进行严密控制，并且在这些国家中驻扎了大量的地面部队，实行军事占领。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五年八月，苏修驻欧洲部队增加将近百分之二十，战术空军实力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在海军方面，苏修波罗的海舰队实际上就是它驻东德和波兰的海军，并在这两个国家里设有苏修海军基地。苏修驻黑海舰队，实际上就是它驻保加利亚的海军，也控制着罗马尼亚的海面。苏修依靠这两支海军力量，事实上已经完全控制了东欧一些国家的海面。奥地利《皇冠报》和法国《法兰西晚报》指出：苏联军队驻扎在东欧，“是为了——至少是部分为了——控制它的卫星国”；苏联不断加强在东欧的军

事实力，这表明它“不想放弃监督一些邻国的权力。”

苏修不仅利用“华沙条约组织”这个工具，对东欧一些国家实行军事控制和军事占领，而且还通过这个组织，对捷克斯洛伐克直接进行赤裸裸的军事入侵，用刺刀制造傀儡政权。

三、索取军事基地和港口设施，谋求海洋霸权

十多年来，苏修拼命发展海上军事力量，疯狂推行炮舰政策，加紧同美帝争夺海洋霸权。它的舰队在全世界的海洋上成群结队，窜来窜去，横冲直撞。为了适应其海洋扩张和称霸世界的需要，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经常以索取海空军基地和港口使用权，作为提供“援助”和扩大贸易的附加条件。据不完全统计，苏修已经攫取的军事基地和取得了使用权的港口近九十处，分布在世界各地。

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是苏修黑海舰队进入地中海的必经之路。苏修为了保住这两个海峡的通行便利，近年来，对土耳其大搞所谓“睦邻政策”，不断增加对土耳其的“贷款”和贸易。到一九七五年，苏修对土耳其的“经济援助”达到了十三亿美元。苏联和土耳其之间的贸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年，几乎没有往来。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缓慢增长。到六十年代中期，苏修进入地中海之后，苏土贸易开始迅速扩大。到一九七二年，苏土贸易额比一九五六年增长了十三倍多。苏修通过增加“援助”和扩大贸易，不仅保住了这两个海峡通行的便利，而且取得了停泊船只的便利。

一九六四年只有十五艘苏修军舰通过两海峡进入地中海，到一九六七年激增到一百五十七艘。七十年代以来，苏修海军通过两海峡的舰只继续增加。一九七五年，通过两海峡的外国军舰共二百四十三艘，苏修舰只占了绝大多数。

在苏伊士运河还未开放的情况下，苏修黑海舰队要经过直布罗陀海峡出大西洋绕道好望角，才能到达印度洋。苏修为了打通地中海通向大西洋的出海口，便加紧拉拢西班牙和摩洛哥，不断增加贸易额和提供“经济援助”。据报道，苏修派出了一千多名“技术人员”，“帮助”摩洛哥修建灌溉水坝，开采新矿以及建立捕鱼队等^①。苏修还表示为摩洛哥提供十艘高速的、可以发射导弹的巡逻艇等等。结果，苏修获准使用这个海峡的港口和停泊船只。目前，苏修还极力谋求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阿耳伏朗岛和卡迪斯岛等地建立军事基地。

苏修以“军援”、“经援”为诱饵，打进了埃及之后，在地中海取得了第一个立足点。据报道，在一九七二年，在埃及可供苏修使用的海军基地和港口，有地中海沿岸的塞得港、亚历山大港、马特鲁港、塞卢姆港，以及红海沿岸的萨法贾和巴纳斯角等。苏修公然在亚历山大港建立了其地中海舰队的指挥中心和仓库等辅助设施，并明目张胆地要求划地为界，悬挂苏联国旗，由苏联大兵把守，未经苏修的特许，就连埃及的最高领导人也不得入内。

叙利亚是苏修在地中海扩张的另一个目标。苏修通过

① 新华社伦敦1973年4月26日电。

“帮助”建筑幼发拉底水坝工程、修建铁路、发展石油和动力工业，并提供导弹和米格飞机等军事物资作为交换条件，取得了在地中海的拉塔基亚港和塔尔图斯港的使用权。

伊拉克，是通往波斯湾的一个理想门户。苏修通过“帮助”开采北鲁迈拉油田，渗入了这个国家。一九七二年四月签订了苏联——伊拉克条约以后，苏修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不断增加，因而取得了在波斯湾顶部的乌姆卡斯尔港建设海军基地的特权。这是一个控制波斯湾咽喉的战略要地。

苏修为了加强对红海和亚丁湾通道的控制，以“援助”为手段，不断对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进行渗透和扩张，获得了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丕林岛、索科特拉岛建立基地和使用亚丁湾的权利。由苏修设计的一座深水港已在亚丁建造，苏修“专家”还参与管理亚丁港口的技术工作。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俄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南也门取得海军设施”和加紧“对亚丁实行更大的控制”，以便进一步“把亚丁变成红海与印度洋之间的一个俄国的重要连接点”^①。亚丁港实际上已成为苏修的军事基地。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揭露，“苏联在这里拥有数百名‘顾问’和包括几架米格—21在内的军事设备。亚丁港经常有两至三艘苏联海军舰只”^②。

索马里面临红海和印度洋西北入海口，位于南也门和曼德海峡、亚丁湾之间，是印度洋和地中海的咽喉，具有重要

① [英]《每日电讯报》1973年7月23日。

② [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年8月15日。

的战略意义。因而是苏修渗透扩张的重要目标。从一九六五年起，苏修一直在“帮助”索马里重建柏贝拉港，这实际上是为它的舰只提供一个新的补给和维修基地。目前，柏贝拉的通讯中心已被苏修所操纵。苏修的军舰和核潜艇也经常停泊在那里。此外，苏修还取得了索马里的另两个重要港口——摩加迪沙和基斯马尤的使用权。苏修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索马里的控制，于一九七四年七月同索马里签订了一项“苏索友好合作条约”。这是苏修同第三世界国家签订的第四个具有军事结盟性质的条约。据报道，苏索还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苏修将在柏贝拉以北修建一个新港口，供其印度洋舰队使用。

苏伊士运河关闭期间，毛里求斯成了中东、亚洲和欧洲航线的中继点。苏修为了在绕过好望角的主要海路上建立一个海军基地，曾施展种种卑鄙狡猾的伎俩，向毛里求斯渗透。它先以缺粮缺水为理由，派渔船驶入毛里求斯的路易斯港，然后，进行种种拉拢活动，向港口当局提出要赠送船坞设备及协助发展港口，等等。当苏修的设备源源运到后，它的军舰便纷纷前来进行“友好访问”，取得了使用港口的便利。结果，毛里求斯成为苏修在印度洋西部的渔船和雷达基地。此外，苏修还谋求在毛里求斯搞一个海军基地。据美国情报界人士说，苏联已同毛里求斯达成协议，以向这个岛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来换取设立一个苏联海军基地^①。

苏修为了监视美国在英属迪戈加西亚岛建立的重大空军

^① 法新社华盛顿1974年6月14日电。

和海军基地的活动情况，正谋求在印度洋的塞舌尔群岛建立海军基地。据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报道：“俄国海军准备当英国今年让塞舌尔群岛独立的时候开进去”。

印度是苏修在印度洋地区进行扩张活动的重要立足点。一九六七年，苏修利用印度急于加强其海军的欲望，答应向印度提供“援助”，但乘机要求印度允许它的太平洋舰队到印度巡航，并向它提供基地。在苏修的利诱之下，通过一系列的密谋活动，苏修同印度作成了一笔肮脏的交易，苏修向印度提供潜水艇和其他海军舰艇，“帮助”把孟加拉湾的维沙卡帕特南港和安达曼群岛的布莱尔港改建成海军基地；印度则向苏修舰艇提供这两个基地的使用权。这两个军事基地，对控制马六甲海峡和孟加拉湾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此外，苏修还通过“军援”，取得了印度西部马尔马冈、孟买和柯钦等港口的使用权。

苏修在“保卫古巴”的口号下，通过“军援”、“经援”等手段，把古巴纳入苏修的势力范围，逐步代替了美帝在古巴的殖民统治。因此，古巴的海港全部向苏修舰艇开放。苏修在古巴的西恩富戈斯海港，建立了一个核潜艇基地，并建造了兵营和核潜艇活动设施。

据报道，为了谋求在西非海岸建立海空军基地，苏修在以向几内亚提供武器作代价，获得在科纳克里建立海空军基地的权利。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伸手，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直接侵犯了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着世界各国

的安全。但是，苏修每侵略一个地方，“就把一条新的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其结果，只能更加激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抗，“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

第四章 苏修对外“援助”的后果

第一节 苏“援”给受“援”国造成的恶果

苏修叛徒集团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干的是帝国主义的勾当，它假“援助”、“合作”之名，行剥削、掠夺、侵略、扩张之实，这除了在政治上使受“援”国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威胁和欺负以外，在经济上也给受“援”国造成了惊人的恶果。

我们列举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使受“援”国生产遭受破坏，严重依附苏修

由于苏“援”具有极其凶残的剥削和掠夺实质，所以，它不仅不能帮助受“援”国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独立发展本国的经济；相反，极大地破坏了受“援”国的生产，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

苏修借“援助”之机，对受“援”国的生产横加了许多框框，迫使受“援”国削减或停止苏修不准发展的某些原料和燃料的生产，严重摧残了受“援”国的基础工业。

以东欧一些“经互会”成员国的燃料、原料工业生产情况为例。由于苏修的干预和破坏，捷克斯洛伐克、东德、波兰的铁矿石生产量，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二年的六年中，

三国平均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三点三。其中，东德的下降幅度，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一九七二年的产量只相当于一九六六年的百分之十六。而波兰也只不过等于一九六六年的产量的一半多一点，为百分之五十四。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三国的煤产量，在这六年中平均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六点五。其中，东德产量下降的幅度也最大，一九七二年产量仅为一九六六年的百分之四十一^①。

由于这些国家的燃料和原料生产，受到极大的摧残，因而，在它们的重要工业原料、燃料进口中，依赖苏修供应的比重不断上升，有的甚至完全仰赖苏修。

目前，“经互会”东欧成员国进口的几乎全部的石油和铁，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铁砂、木材，四分之三的石油产品、金属轧材、磷肥，五分之三以上的棉花、煤、锰矿石，都来自苏联^②。

苏修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强迫受“援”国改变工业结构，按照苏修所需要的品种、规格、型号进行生产，给受“援”国的加工制造工业带来极大的破坏。

东欧的一些国家在苏修的殖民统治之下，不得不把较大的生产能力，用于生产苏修所需要的产品，以供对苏的出口。如一九七〇年，在保、匈、东德、波、捷五国的机器设备出口总额中，对苏出口平均占百分之四十点二。其中，东德、波、捷三个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则占这五个国家对苏

① 根据联合国《统计月报》1973年10月号数字计算。

② [苏]《共产党人》杂志1974年第5期。

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三以上。

由于这些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能力要按照苏修的规定来生产，因而，原有工业结构被破坏了。例如，东德为满足苏修的需要，改变了生产方向，使一些过去生产水平较高的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地下降了。一九七一年同一九六五年相比，挖土机产量下降百分之五十点七，干线电器机车产量下降百分之八十；一九七〇年的汽轮发电机产量比一九六五年减少百分之八十二点六；一九七一年虽有回升，仍比一九六五年减少百分之六十二^①。

许多年来，匈牙利的加工制造工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个国家的汽车和造船工业，本来都有一定的基础，但在苏修的控制下，为完成供应苏修产品的生产，被迫停止小汽车、普通卡车和一千五百吨以上船舶的生产，因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苏修通过“援助”，残酷地掠夺受“援”国的农副业产品，加重了对受“援”国农民的剥削，造成农业生产的急剧下降。

例如，印度是一个农业国家，苏修对印度投入了大量“援助”，但印度的农业生产不但没有发展，反而日益恶化。印度的粮食产量，在六十年代最初几年，都是停留在八千万吨上下。一九六四年，粮食产量曾达八千九百万吨，但这一年仍然出现了全国性饥荒。其后几年，产量又大幅度下降到七千二百万吨和七千四百万吨，饥荒情况更加严重，出

①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59页。

现了饿殍遍野的惨况。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年度，由于天时较好，粮食产量虽有上升，但仍远远不能自给，不得不大量进口美国“剩余”粮食。据前些时候的报道，在全国的二十一个邦中，有十四个邦严重缺粮，其中以马哈拉施特拉邦、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和拉贾斯坦邦为最厉害。共有五千多人口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就已有两千万人由于无法解决吃饭问题而离乡背井，到处流浪。全国五亿人口中，约有两亿多人挣扎在饥饿线上。

古巴由于被迫畸形发展蔗糖生产，农业和畜牧业生产都受到很大的损害。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在一九七二年四月一次讲话中承认：“由于繁殖率下降，死亡率增长，畜牧业今年仍处在停滞状态。在一九七〇年以前的几年，我们的牲口曾达到七百万头的最高峰，后来下降到五百万头，几乎损失二百万头牲口。自一九七〇年炼乳生产萎缩，牛奶收购下降”，“在一九七一年我国喝的牛奶百分之七十点七为进口奶”。农业生产很落后，“人畜消费的小麦、面粉、玉米等粮食都必须进口。”^①

苏修的控制和掠夺，使以畜牧业为基础的蒙古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打击。最近几个五年计划规定的牲畜增殖指标和近十多年的年度牲畜增殖计划，都没有完成。一岁以下的幼畜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现在已经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牲畜质量降低，体重越来越轻。

① 多尔蒂科斯1972年4月3日在古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二、使受“援”国的贸易赤字不断上升， 外债不断增加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通过对外“援助”，加紧商品输出，实行贵卖贱买，使受“援”国倍受剥削，贸易逆差不断增加，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这方面，蒙古和古巴受害最为严重。由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剥削，一九六五年蒙古对苏贸易逆差为其输出总额的百分之一百多；以后，蒙古的对苏贸易情况更加恶化，到一九七二年，对苏贸易逆差为其输出额的百分之二百八十五点二。古巴对苏贸易的逆差也很大，仅一九七二年，逆差额就达四亿一千万卢布，为古巴当年对苏出口总额的两倍^①。

此外，其他的许多受“援”国，也大都发生对苏贸易逆差。例如，波兰、东德同苏修之间的贸易，历年来也逆差居多。伊拉克的对苏贸易，在一九六五年还处于平衡状态，到一九七二年，其对苏贸易逆差已接近其输出总额的一半^②。

苏修的对外“援助”，不但给许多受“援”国带来大量的贸易逆差，而且还造成负债累增，财政状况日益恶化。

印度接受的苏“援”比较多，因此，它的负债也最重。至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印度欠苏修的债款已达三十六亿九千万卢比。到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已增至三十八亿五千万卢比。印度报纸揭露，近几年来，印度每年必须偿付

① 根据联合国《统计月报》1974年7月号数字计算。

② [英]《政治家年鉴》1972—1973年第338页。

给苏修的“贷款”本息，都在二十亿卢比左右。而印度得到苏修的“经援”，每年只有一亿五千万卢比左右^①。

近几年来，印度的财政赤字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增加，一九七一年，印度财政赤字一年中翻了一番，达到七十一亿卢比。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度，进一步增加到八十四亿八千万卢比。据印度报纸透露，到一九七四年三月底，印度的财政赤字突破百亿大关^②。

中东一些国家的情况，并不比印度好一些。苏修利用中东战争之机，大耍两面派，以“援助”阿拉伯人民为名，大做军火商，大量向埃及、叙利亚等国倾销军火，给一些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负担。据一九七三年四月《金融时报》报道，一九七三年埃及的债务相当于埃及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主要债权国就是苏修。

蒙古和古巴，更成了不可解脱的对苏欠债户。到一九七一年，蒙古欠苏修的债，按人口平均计算，竟达到每人近两千美元，成为世界上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最大债务国之一。古巴也是负债累累，到一九七二年初就已超过四十亿美元。这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加在所谓“兄弟国家”人民头上的沉重负担。

三、使受“援”国经济衰退，物价上涨， 人民生活下降

在苏修的控制和掠夺下，许多受“援”国的国民经济日

① [印]《金融快报》1975年3月17日。

② 《人民日报》1974年3月13日。

益衰退，市场供应紧张，物价不断上涨，劳动人民日趋贫困化。

捷克斯洛伐克原是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的国家之一，但在接受苏修的“援助”和被其占领之后，经济情况急剧恶化，许多工厂因原料被苏修控制而开工不足，许多商店的货架空无一物，特别是食品和日用生活品，更是非常缺乏。据外电报道，一九六九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前，捷克斯洛伐克有许多商店连面包牛奶都卖光了，甚至首都布拉格也是如此。为此，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不得不高抬物价。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开始，许多商品价格成倍增长。食品罐头价格上涨一倍，酒类上涨百分之二十五，羊毛制品上涨百分之五十，亚麻布上涨百分之二十。到一九七〇年，一双皮鞋的价格已提高到四百五十克朗，相当于提价前的三倍^①。

波兰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每况愈下。一九六九年三月，波兰《经济生活》发表波兰中央统计局搜集的关于城市的供应情况表明，许多城市的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不足。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三日，波兰当局大幅度提高物价，肉类涨价百分之十七点六，面粉百分之十六，牛奶百分之八，鱼类百分之十一点七，面条百分之十五点三，煤百分之十以上，棉织品百分之十四点五，皮鞋百分之二十三，居民常用的咖啡代用品价格猛涨百分之九十二点一^②。一九七四年一月份，又把部分酒类和食品的价格提了百分之二十三、二十五、三十

① 美联社莫斯科1973年8月10日电。

② 新华社华沙1970年12月13日电。

三不等^①。这给波兰人民增加了难以忍受的负担。

匈牙利的物价也是不断上涨。一九七〇年食品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五点六；一九七一年起，房租也上涨了一倍。这都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的生活。

苏“援”给印度带来的不是经济繁荣，而是经济全面恶化，人民灾难重重。印度总统吉里在一九七三年国庆讲话中惊呼，印度正在经历着一个“经济受到空前重压和紧张的时期”。近几年来，印度人民一直喘息在物价飞涨的重压之下。据印度报纸报道，所有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从粮食、蔬菜、食用油、糖、棉布、肥皂到煤油等，在一九七三年里分别涨价百分之五十到一百五十之间。印度《自由新闻》透露，由于棉织品涨价最厉害，因而出现了“老百姓无法穿件象样的衣服来遮盖他们的惨状”。

印度当局为应付困境，不得不年年滥发纸币，通货总量在四年中增加了百分之九十。结果又引起了物价上涨，陷入了经济的恶性循环之中。

毛主席指出：“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它们都坏事干尽，丑事做绝，而在欺负人方面，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尤为恶劣。这必将激起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强烈不满，终将受到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严厉惩罚。

① 新华社华沙1974年1月20日电。

第二节 受“援”国的觉醒与反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受苏“援”之害的第三世界国家已经日益觉醒和壮大。它们具有强烈的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坚决揭露和反对苏修到处欺负、侵略和剥削别国的强盗行径，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斗争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在所谓“大家庭”的幌子下被置于附庸地位的一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和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奔腾向前，世界形势有如“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第三世界受“援”国日益觉醒、壮大， 敢于同苏修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第三世界受“援”国通过自己的实践体会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凶恶敌人。它们日益觉醒和壮大，并正在进一步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地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展开坚决的斗争。在国际事务中，它们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三世界受“援”国的日益觉醒和壮大，首先表现在他们逐步地认清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本性，看穿了苏“援”的凶残实质。

苏“援”给受“援”国带来的巨大祸害，从反面教育了第三世界各国人民。他们认识到，苏“援”就是苏修剥削

和压迫别国的一种手段。第三世界国家的报刊强调指出：苏联的“经济援助和贸易，事实上是为它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服务的”^①。苏联把自己打扮成为“援助”者，但干的完全不是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事情。不管是在亚洲、非洲，还是拉丁美洲，它到处都在利用“援助”进行剥削、控制和颠覆。在联合国大会的讲坛上，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揭露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利用“援助”对第三世界进行的剥削和掠夺。乌干达代表埃蒂昂在发言中指出，被看成是富国对穷国的“施舍”的“援助”，是使殖民主义的主仆关系的旧传统继续存在下去，有损于受“援”国的政治独立。富国提供“援助”的条件如此苛刻，以致受“援”国的外债继续按几何级数增长。乍得代表一针见血地指出，富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所谓“援助”，只是对这些富国有利^②。布隆迪、塞内加尔等国的代表指出，不是穷国靠富国来养活，而是富国靠掠夺穷国发财致富。不是富国“援助”穷国的发展，而是穷国援助富国的发展^③。他们还进一步认识到，要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绝不能依靠苏修的“援助”，而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如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在第六届联合国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自力更生是他们政府的“经济政策基石”。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豺狼本性和凶恶嘴脸，已经被越来

① [阿根廷]《七天》杂志1975年第398期。

② 《人民日报》1974年4月26日。

③ 《人民日报》1974年4月20日。

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所识破。它们指出，必须“把莫斯科和华盛顿看作两个国际殖民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①“苏联是用朋友的外衣掩饰起来的敌人”，“苏联帝国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以一种无耻的方式瓜分地球”^②。这个自称第三世界“天然的同盟者”的“社会主义国家”，原来“是隐藏起锐利犬牙而伪装成一头无罪的羔羊的假朋友”^③。

第三世界受“援”国的日益觉醒和壮大，还表现在它们在反霸斗争中加强了团结。

毛主席指出：“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第三世界受“援”国在斗争实践中，逐步体会到这个真理。他们认识到，只要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敢于斗争，就一定能够战胜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近几年来，团结反霸的呼声，越来越高涨。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指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和壮大，要“靠我们的斗争，靠我们对团结的觉悟，特别是要相信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能力。”^④阿根廷一家报纸指出：“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的时候，就会完全改变世界的格局。”^⑤乍得外交部长迪布赖巴耶·多拉尔塔在联大特别会议发言中提出：“第三世界国家团结一致，组成整

① 新华社阿尔及尔1973年9月8日电。

② 香港《经济导报》1973年10月1日。

③ [科]《舆论报》1973年12月30日社论。

④ 《人民日报》1974年4月9日。

⑤ [阿根廷]《新闻报》1973年3月3日。

体，万众一心，以便废除目前的剥削制度，建立一个更加独立的经济”^①。这些正义的呼声，反映了第三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

现在，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团结反霸的怒涛，猛烈地冲击着苏修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堤坝。他们在斗争中加强团结，同仇敌忾，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已经越出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汇成了一股具有洲际规模和世界规模的强大的革命洪流。

第三世界受“援”国的日益觉醒和壮大，又表现在它们的目标明确，旗帜鲜明，敢于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七三年九月举行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共有七十多个国家参加。会议的反霸呼声很高，矛头直指超级大国。苏修慌了手脚，千方百计进行捣乱破坏。在会议召开前，苏修就企图以“观察员”身分挤进会场，但遭到了不结盟国家的拒绝。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又给会议东道国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写信，不许把世界分为“大国”和“小国”、“富国”和“穷国”，尤其不许把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相提并论”。苏修的荒谬要求和无耻恫吓，激起许多到会国家首脑的极大愤慨。在会议期间苏修又派人在会上制造纠纷，挑起争论，妄图扭转反帝、反殖、反对超级大国霸权的政治方向，结果又彻底失败了。这次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明确指出，当前世界是一个“少数富国旁边存在着多数穷国

① 《人民日报》1974年4月26日。

的世界”，给了苏修有力的回击。

一九七四年四月举行的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反霸的新形势，标志着第三世界的进一步觉醒和壮大。苏修出于其霸权主义的立场，极力阻挠和破坏会议的进展。在会议期间，苏修代表赤膊上阵，蛮横地叫嚷，不准提“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准区分“穷国和富国”，并且威胁会议一定要“保证所有国家的利益”。苏修的这些卑劣表演，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身陷重围，受到第三世界国家代表的迎头痛击，遭到可耻的失败。会议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要求打破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对国际经济的垄断，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关系。它表达了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求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的迫切愿望。

第六届特别联大以来，发展中国家为贯彻《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正确原则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它们联合斗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团结日益巩固，目标日益集中，斗争的矛头直指苏美两霸。在资源、贸易、工业化、金融、航运等各个重要领域内，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经济权益、发展民族经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正义斗争，正在坚持不懈、日益广泛深入地展开，并且不断取得胜利和进展。

二、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本国自然资源

第三世界受“援”国为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本国自然资源，以争取和巩固政治独立与经济独立，同苏修社

会帝国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许多受“援”国都纷纷拒绝苏修通过“援助”来勒索军事基地的无理要求。例如，在叙利亚，苏修用拖延武器的供给和对先进武器的控制为手段，对叙施加压力，但阿萨德总统还是“拒绝了苏联向叙利亚提出的”以“援助”“换取叙利亚（同苏联）缔结一项巴格达和苏联之间的条件一样的友好条约”的建议。以后，“阿萨德总统还拒绝了苏联在缔结这一条约的尝试失败后提出的另一建议，即要求在叙利亚的几个港口建立苏联的海军基地。”^①在非洲，利比亚政府曾拒绝苏修提出的让它的地中海舰队使用利比亚海军设施和向利比亚提供“顾问”等建议。

有些受“援”国还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收复已被苏修霸占的军事基地和港口。例如，在埃及人民的坚决支持下，埃及政府收回了苏修霸占的一些基地。一九七二年七月，埃及总统萨达特宣布，苏修在埃及领土上建立的一切设施和军事装备，全部成为埃及的财产，由埃及武装部队管理。一九七六年三月，埃及正式宣布废除所谓“埃苏友好合作条约”，并且决定在废除条约的一个月内，苏修必须撤离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这些果断的措施，表达了埃及人民反对苏修的控制，决心掌握自己命运的坚强意志，受到埃及人民的热烈支持和拥护。

在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上，第三世界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然资源，要求对自然资源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包括控制“跨国公司”的活动，直至采取国有化的措施。七十七国起草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

① [英]《生活报》1973年9月19日。

言》，为此规定了一条原则：“每个国家有权对其自然资源实行有效的控制，包括实行国有化或把所有权转给本国国民，在实行国有化时，如发生争端，应按各国的国内法加以解决。”这条原则，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保卫自己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经济权益的迫切愿望，是对苏修通过“援助”疯狂掠夺别国资源的又一个沉重打击。

为了反对苏美两霸的海洋扩张，保卫领海主权，维护海洋资源，许多国家主张沿海国家有权根据本国自然条件的具体情况和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确定适当宽度的领海，并有权在领海以外规定适当范围的专属经济区或捕鱼区。目前已有六十多个亚非拉国家分别主张或正式宣布二百浬的领海或专属经济区等不同形式的国家管辖范围。受苏修控制较深的印度，也“提议沿海各国在它们的领海之外划定专有捕鱼区，以便维护它们的海洋资源，使得在远洋捕鱼的其他国家不得进入这个区域之内”，以“保护发展中的沿海国家的经济利益”^①。许多海峡沿岸国家也坚决主张领海范围的海峡是沿岸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联合国大会上，斯里兰卡等二十七个印度洋沿岸国家，毅然提出印度洋为和平区的主张，以抵制苏美称霸海洋的活动。

三、反对苏修的残酷剥削，要求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苏修仗“霸主”、“债主”之势，操纵和垄断受“援”国

① [印]《印度时报》1973年1月22日。

的对外贸易，实行贵卖贱买，把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强加于受“援”国。这种骇人听闻的剥削，早已激起受“援”国的切齿痛恨和坚决反对。

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都愤怒谴责这种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坚决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指出：“目前这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必须改变”，第三世界国家“将尽一切努力去达到这些目的”^①。科威特《舆论报》和扎伊尔《劳动报》都为此发表了社论，它们说：“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必须改变”^②；“不管要付出多少代价，世界必须结束目前的国际秩序，因为这种秩序使一些人能垄断一切，而其他一些人却正在为需要而感到忧虑”^③。被禁锢在所谓“大家庭”里的“兄弟”国家，也起来造反，对苏修的损人利己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如保加利亚《新时代》杂志一九七三年第九期和第十一期就先后发表文章指出，“在某些经互会国家发现有只顾自己的倾向”。“在经互会市场现行外贸价格的情况下，出口机器的盈利通常是很高的”，“农产品价格定得较低”，“必须首先调整某些……现行合同价格，比如农产品的价格”以“保持一致性和互惠”。匈牙利出版的一本书也指出，“经互会”内的不合理的贸易价格，“给一些国家带来了严重损失，而对另一些国家带来巨大的利润”。

① 《人民日报》1974年4月14日。

② [科]《舆论报》1974年4月19日社论。

③ [扎]《劳动报》1974年4月24日社论。

在一九七四年召开的联大特别会议上，第三世界受“援”国强烈要求实行合理价格和公平贸易。肯尼亚外交部长恩乔罗吉·蒙盖在发言中提出：“应该使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上保持稳定和公平的价格”。他还明确指出：“依靠我们出售原料所得的收入总比外援较为可取”^①。由七十七国集团起草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要求。苏修代表为了维护本国的殖民利益，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横加反对，他首先从第三世界起草的这篇《宣言》的标题开刀，不准提“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要把它改为什么“建立和维持公正的和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苏修这种蛮横霸道的行径，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严正谴责。塞内加尔代表梅杜恩·法尔直截了当地指出，“新的”这个词是关键。因为只有破坏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才能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另一个非洲国家的代表说，如果接受苏联的修正案，使第三世界遭受了几个世纪剥削的那种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就得维持下去^②。大会冲破了美苏两霸的阻挠，通过了这个《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提出了一系列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原则，其中指出：“一切国家有平等地参加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不容剥夺的权利”；“发展中国家有权建立原料初级产品生产国联合组织”，以维护第三世界各国的切身利益。这表达了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超级大国掠夺和剥削的正义要求。

① 《人民日报》1974年4月24日。

② 《人民日报》1974年4月19日。

为了打破超级大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维护原料价格，保卫民族资源，第三世界原料和初级产品出产国纷纷组织起来，建立了许多新的或加强了原有的原料生产国组织。仅在一九七四年一年内，第三世界就组成了铝土、铁、汞、油料、食糖、香蕉、肉类七个原料和农产品输出国组织。几内亚总统杜尔在一九七四年三月召开的铝矾土生产国国际会议上讲话中指出：“老牌帝国主义的殖民剥削已为新型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剥削所代替”，必须“使得把各国连接起来的贸易关系更加公正、更加合理和更加合乎逻辑”。他强调说：“争取矿物或植物原料同工业品之间贸易关系平等化的战斗已经打响”，“我们必须赢得这场战斗”^①。

在联大特别会议上，七十七国集团把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加强主要产品生产国协会作为一条原则写进了《宣言》。苏修代表又大放厥词，表示反对。面对苏修的挑衅，第三世界国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秘鲁代表义正辞严地说，发展中国家有权组织起来，无需任何人批准。扎伊尔代表指出，发展中国家有权组成生产国协会，现在有人想阻挠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起，反对组织生产国协会，这是一股逆流^②。苏修代表用尽气力来胡搅蛮缠，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① 《人民日报》1974年4月19日。

② 《人民日报》1974年4月23日。

四、轰走苏修“专家”， 撤换苏“援”武器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趁“援助”之机，大量向受“援”国派遣所谓“专家”、“顾问”，在受“援”国享受种种特权，控制别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日益引起受“援”国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例如，苏修在中东“六·五”战争之后，以提供军事“援助”为名，大量向埃及派遣军事“顾问”或“专家”，从上到下地控制埃军的作战计划、训练和装备。苏修对埃及内政的干涉，引起埃及政府和人民的强烈不满。埃及总统萨达特说：“苏联人牵着我就象牵着一个要他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傀儡”，“我拒绝在埃及的领土上接受不是我们自己的也不是埃及最高政治指挥部的意志”^①。因此，在一九七二年七月八日，萨达特总统宣布：“结束苏联军事顾问在埃及的使命，限期回国”。这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继埃及之后，叙利亚政府也在一九七二年九月宣布，“对在叙利亚的估计三千名苏联专家实行通行证制度，禁止他们没有当局书面批准而在叙利亚走动。”他们“只有持有叙利亚国防部的特别许可才能走动”^②。一九七四年七月，又有一批苏修军事“专家”被赶出叙利亚。据法新社报道，“在叙利亚导弹基地和雷达站工作的几十名苏联技术专家应叙利

① 《人民日报》1974年5月4日。

② [塞]《东方一日报》1973年9月27日。

亚政府的要求，已经停止工作，离开了这个国家”^①。

为了摆脱苏修的控制，许多国家都在努力改变“苏联是武器装备唯一来源的现象”。例如，埃及在一九七二年七月赶走苏修“顾问”之后，一直在谋求“完全换掉埃及空军中的苏联装备”，力求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代替苏联武器的武器”。据一九七四年五月贝鲁特《事件》周刊报道，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对该刊主编谈话时说：“我拒绝以自由的代价来取得苏联的飞机”^②，并表示将使埃及的军事装备来源多种多样。一位埃及军事人员在同外国记者谈话时，深有感慨地说，“俄国人的武器再也不是这个战场上唯一的武器了”^③。

同样，“一直完全依靠苏制武器武装它的武装部队”的叙利亚，也“已决定购买英国和法国的军用飞机和其他武器”^④。印度也公开表示，虽然“印度和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但并不意味着在每一件事情上，印度都同意苏联的做法”^⑤，“我们不能只依靠一个大国”^⑥。

五、摆脱苏修控制，发展民族经济， 扩大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

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越来越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他们要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决不能依赖超级大国的所谓“援

① 法新社贝鲁特1974年7月4日电。

② 《人民日报》1974年5月4日。

③ [黎]《事件》周刊1973年8月30日。

④ [黎]《生活报》1973年9月23日。

⑤ 印报托新德里1973年5月19日电。

⑥ [美]《纽约时报》1973年12月7日。

助”，而是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同时，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接受平等互利的外援，作为发展民族经济的辅助手段。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贯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方针，发展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联系，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赞同和支持。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对我国革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克雷库总统在访问我国期间说：“中国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的榜样，对首先依靠自力更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决心坚定地沿着光荣和尊严的道路向前迈进的贝宁人民来说，确实是真正的推动力和鼓舞的源泉。”^①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第三世界的真正希望。”^②

坦桑尼亚、赞比亚和中国友好合作共同建筑的坦赞铁路，从一九七〇年十月开始动工，经过五年零八个月的艰苦努力，胜利竣工。全长共一千八百六十公里。坦赞铁路的胜利建成，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互相支持发展民族经济的伟大成果。它大长了坦赞人民和伟大非洲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的威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说：“这条伟大的自由铁路实际上表明，只要有志气、下决心为共同的目标进行合作，人们必定

① 《人民日报》1976年7月21日。

② 《人民日报》1976年7月16日。

成功。”他还说，从坦赞铁路，我们看到了非洲抵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的一个实际表现。^①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说：“这条铁路将对非洲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②。

东欧一些国家，注意发展粮食生产，以克服苏联经常削减供给粮食的困难。一九七四年，波兰举行各种会议，讨论发展农业生产、保障食品和牲畜饲料的供应问题。捷克斯洛伐克近年来采取了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争取在几年内逐步达到粮食生产自给”。东德为提高粮食生产，决定将增加十一万六千公顷的粮食播种面积，同时注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③。

为了摆脱苏修的控制和剥削，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保加利亚等国，近年来采取各种措施，减少从苏联进口石油。这些国家都强调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国燃料基地”，提高燃料产量，以“弥补进口燃料的不足”。目前，他们着重抓煤炭生产，尽量减少使用液体燃料。此外，还不断增加从中东和北非地区进口的石油量，或者利用西方技术，计划开采大陆架石油^④。

近几年来，东欧一些国家“已理解到，过度依靠一国的支持不是好现象”^⑤，从而开始“不按苏联的样子行事

①、② 《人民日报》1976年7月16日。

③ 《人民日报》1975年9月6日。

④ 《人民日报》1975年9月14日。

⑤ 香港《展望》杂志1973年4月。

了”^①。他们相继越出苏修控制的圈子，积极发展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从六十年代中期起，东欧一些国家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增长率有了明显的提高。对此，苏修感到十分恼火。它一再强调要东欧各国承担义务，保证同苏联的贸易比同西方有较快的增长。可是，东欧一些国家并不理睬苏修的这一套，继续发展同西方的经济往来，使它们对西方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对苏贸易的增长。例如，波兰同西方的贸易额在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三年的三年中，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以上，而它同苏联的贸易，在同期内仅增加了百分之十九多一点。匈牙利对西方的贸易额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期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四，而对苏贸易额在同一时期则只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一左右。保加利亚、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趋势。

长期以来，东欧一些国家机器设备的进口绝大部分来自苏修。它们所需要的工业原料、燃料绝大部分甚至全部也仰赖苏修。为了摆脱对苏修的依赖，它们认为向另外一些国家进口上述物资，“是必不可少的”。波兰更明确表示，在这方面增加从西方的进口，对波兰的发展“具有基本意义”。因此，近几年来，东欧一些国家从其他国家进口机器设备、原料和燃料，有了显著增加。例如，一九七五年捷克斯洛伐克从西方进口的机器设备的比重，已从十四年前的百分之十六，提高到百分之三十八。而且，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为了从中东进口石油，目前东欧一些国家正在计划建造一条输油管，

^① [美]《纽约时报》1973年7月1日。

从中东经南斯拉夫输送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最近几年，东欧一些国家还同西方发展了一些其他的经济往来。如企业之间的“生产协作”关系、信贷关系和从一些国家购买专利权等。例如，保加利亚已经同西德、奥地利、意大利、法国等建立了“工业生产协作关系”。一九六八年，匈牙利同西方国家签订的“生产协作协定”只有五项，到一九七三年底，已增加到三百项。最近三年中，波兰也同美、法、西德、比利时、挪威等国签订了长期的经济、科技“合作协定”或“工业协作协定”，并从这些国家购买专利。

“经互会”其他成员国，对于苏修强迫下推行的“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给本国带来的严重恶果，公开表示不满。波兰总理雅罗谢维奇说：“经互会在专业化与生产方面的活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①。波兰报刊公开抱怨说，在“经互会”内搞“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使波兰产品结构不够多样化”，同波兰的“生产潜力不相称”，“从技术进步、原料投资观点来看，都是不利的”。保加利亚《国际经济关系》杂志进一步指出，这样的“国际分工”“会使各国的发展产生片面性和依赖性”。因此，有些东欧国家为了能方便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对苏修让它们放弃生产一些所谓“不大批生产的不盈利的产品型号”的决定，进行抵制^②。有些“经互会”东欧成员国，为了提高自己的工业技

① [英]《外事报道》1971年1月14日。

② [苏]《经济问题》1973年第1期。

术水平，热心于同西方国家进行“生产协作”，对苏修分配给它们的“生产专业化与协作”任务，则持消极态度。

※ ※ ※

恩格斯指出：“谁也不能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受惩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29页）毛主席教导说：“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就是这样的条件。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372页）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到处侵略扩张，横行霸道，妄图称霸世界，但是，历史的发展却同它的愿望完全相反。苏修的侵略扩张政策，使帝国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在国内，工业生产的增长率不断下降，民用工业十分落后，农业日益萎缩，粮食连年减产，市场商品供应紧张，物价上涨，卢布贬值，对外借债，对内赖债，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苏联的广大劳动人民对苏修叛徒集团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愈来愈尖锐化。在国外，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豺狼本性，已经充分地暴露出来，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陷入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反霸斗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苏修和美帝的矛盾和争夺进一步激化，尽管苏修到处散布“缓和”、“裁军”的烟幕，但它们总有一天会打起来的。现在，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表面上尽管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还张牙舞爪，气势汹汹，但实际上，它已坐在火山口上，危机重重，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苏修做的坏事越多，从反面给人民的教育也越大，促进了人民的觉

悟，为自己的灭亡准备了更加充分的条件。历史的进程必将进一步表明，无论苏修怎样疯狂挣扎，它终究逃脱不了世界革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惩罚。

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彻底打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